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每份售五千元·

第三卷 第十三期

專論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孫克寬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蕭公權

歐洲通信

西歐紀行：(三)義大利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國軍全盤戰略（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吳有訓出國記（中大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廣東的走私（廣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人物及事業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余才友

書評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李理黃

讀者投書

我不贊成哲學概論定爲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關於冤獄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關於火車票人推

浙大情形

在美國的煩惱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剛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澂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李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illegible]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曾昭掄 傅斯年 楊人楩 費[illegible]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illegible] 蕭乾 [illegible]

讀者投書

我不贊成哲學概論定為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編者先生：在一般人不十分重視哲學的時候，大學裏却把「哲學概論」定成了一年級共同必修的課目。可是我們站在愛護哲學的立場，實在不贊成這樣作，因爲一則爲了給各種科學的初學者講哲學，就不免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就容易走入曲解；二則凡是定爲必修的課程，就有了強迫性，有了強迫性就反而容易降低學習者的興趣。總之，這樣決不是愛哲學，而是害哲學。——弄得人人對哲學就討厭了！我記得從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抽屜裏是給倫塞上一部聖經，學校當局的意思是要我們因此奉了教，殊不知這樣一來的結果，我們反而很多人成了無神論者了。許多大人先生不許青年看「性史」，可是「性史」不脛而走，原因很簡單，就在禁止。禁止造成了神祕，神祕本身就具備了誘惑性。所以他們的禁止等于提倡，而提倡也流入禁止。將來如果哲學無人問津，便一定是上了現在這樣「提倡」的當了！

再說站在愛護青年的學生（大學裏一年級的學生）的立場，我們也不贊成把「哲學概論」定爲共同必修。這是因爲：這時的青年正是生命力最活潑，最新鮮，最飛躍的時候，應該引導他們在眞實的人生裏去發光，發熱，不該把他們牽入生命已經褪了色的枯寂的概念遊戲裏。我覺得這樣便未免太違反人性了；至少我自己就于心有點不忍！

至于現在的大學裏何以忽然有了共同必修的哲學概論一課，據說是由「黨義」蛻來的。「黨義」一度叫「國父遺教」，後來因爲爲人詬病，便想取消「黨義」，代以「民生哲學」，或「國父哲學」之類。大概在教育部招集的課程會議上吧，中央大學的幾位哲學教授說，如果那樣的課程歸哲學系，只好敬謝不敏。所以折衷的結果，便只露出了「哲學」二字。但是仍然要青年們不要走了「邪途」的吧，又變成一半「哲學概論」，一半「倫理學」，各授一學期。至于「哲學概論」能不能在半年裏講完，「倫理學」是否是相當于從前的「修身」，以及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後來似乎也並不追問了。這就是現在大學裏的學生必須有着哲學的訓練（不，只是有着這末一門必須課程）的來歷。

這樣把來歷說明，也許就乏味了點。而且聯想下去，「哲學概論」有走上從前「黨義」一課程的命運的可能（從前學過「黨義」課的人，和教過「黨義」課的人，心裏都明白大家那時的興趣是怎樣的）。試想那樣的話，豈不太不起哲學，也太對不起青年了？

我並非痛惡哲學，也並非不贊成一般人有一點哲學訓練，然而我實在不贊成現在這樣排入大一的共同必修，而且，只有半年！爲什末還樣不合理？一看方才說過的「來歷」就明白！假若爲學生想，或者爲哲學想，最好是在有着適合的教師這個條件之下，改爲課外系統演講，或者改爲選修。不必限定一年級的學生聽，而講授時間尤其應該定爲半年！

方 穆　十月三十日　北平

關于冤獄

編者先生：謝冠生部長最近發表過一次談話，是關於冤獄賠償法之制訂與實施的，他定了一個期約，以明年爲始，來部份實施外國的冤獄賠償制度。這自然是個響應的號召，在司法改良一方面內，無疑的發生好影響。

截至今日爲止，在歐美行之有效的良好司法制度，如陪審制，提審法，冤獄賠償制等，在高瞻遠矚之士，顧思一一移植之於中國，而同樣爲我國民衆造福。可是也有一部份腳踏實地之士，以爲制度雖佳，則之於今日之中國，仍未免懸格太高，理想自理想，我們仍無法一蹴而幾。此從歐西各國司法演化「盤根錯節」之歷程可以知之。其在我國，今日司法之改良，不在於歐美有什麼，我們也必須有什麼，而在於就現有的基礎之上，規模之下，加以鞏固，擴大之，然後可以講求進一步之擴充與改造。在以上兩種各看所見的主張下，平情以論，我們寧可附和第二種主張。如其基礎未備，人才未充，徒然稗販西制，勉強則之，則逾淮之橘，反近於不倫不類，徒然有個點綴而已，於民衆無與。

職是之故，我們認爲居今日而言冤獄賠償，實不知從另一方面着眼，切實講求如何儘可能以減少冤獄之成立，更屬爲計之得。譬圍若干政治犯人，初則經過不盡不實之情報，舉而選之於法網以內，繼則提付軍法處理，（因此可以不必經過一般之普通法律程序，）勢禁形格，備極森嚴恐怕之至，最後深文羅織，而以「莫須有」三字定讞者，求之已往，誠恐未必無之。而此固非冤獄賠償制度所得而糾正也。今日之下，問題不在於是否也與歐美各國一致，你有我也有大家都有這麼一個冤獄賠償的制度，而在於從實際着眼想辦法免於冤獄之可能成立。假如不此之圖，唯制度之有無，法典之備否爲努力之目標，則被躬負造成冤獄之責者，未嘗不可能繞過這個冤獄賠償法以有所行動，而法律亦終於有等於無、軍法審判之嚴格的限於軍人犯罪之審判而不及軍人以外之任何個人，我們認爲乃是今日減少「冤獄形成的可能性」的重要前提。我們這裏把冤獄賠償與軍法審判兩者相提並論，實在是一種「綜名核實」的辦法。自然不是說軍法審判就無例外的一律會形成冤獄，而只是依據訓政時期約法與憲法之規定，軍法審判不能適用於非軍人一點，同時又深慮軍法審判之下，犯罪嫌疑者或不能盡其辭，屈打成招，亦非絕無。故以是爲請。

郭子韻　十一月七日　杭州

浙大情形

編者先生：于子三案發生後，浙大同人都顯得有些手脚無措，雖然一致憤懣，但均敢怒而不敢言。教授會宣言本定十月三十一日寄發，但因稿成後，經過多人之手，斬頭斬尾，面目全非，力量大減。另有一部份同人，擬成一文，籲請政府保障人權，禁止傷害學生，但簽名時，有人主張簽名的人要增加一些才可發出，以致一再遷延，終未發出。竺校長爲一正直之學者，此爲社會所公認者，惟治安當局恆以「浙大是共產黨之大本營」「竺可楨縱容共產黨」，掛在嘴邊，而學生方面又怪他態度軟弱，奔走終日並無結果，聞竺氏此次去京，已向當局呈辭。假如他眞的做不下去了，未免可惜，竺先生確是一個好校長，實際上在這種環境下，換來任何人也是弄不好。吳有訓先生已出國了，看樣子好人都幹不下去了！

XXX　十一月八日　杭州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編者先生：最近教育部又保送了大批青年軍入各大學就讀，此事已引起若干學校的反對，其是非曲直是很明顯的：

（一）暑假中成千成萬的青年，費盡千辛萬苦，投考大學，但是每校取錄者不過數百人，（下接十三頁）

觀察

儲安平主編

第三卷　第十三期

卅六年十一月廿二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七萬元　航掛：八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四萬元　航掛：十六萬元

知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中一號

本期作者

陳之邁：前清華大學教授

孫克寬：內政部參事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余才友：北平經世月報編輯

李理黃：河南大學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我國討論行政改革的人，包括政府機關和專家學者，對於改革行政大都有幾個習常引用的公式。我們不談改革行政則已，一談起來，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必定被人反覆引用，做來做去還是那篇陳腐不堪的老文章。這幾個公式好像已經成了眞理，只要政府有決心與毅力，依照着這此公式雷厲風行，中國的行政便有起死回生的奇效。

這幾個公式已經用了幾十年了，中國的行政今天仍待改革，甚而更需要改革。這好像是一個病人服了這幾劑藥已經二十年了，他的病反而顯得更沉重起來，而我們所知的只是叫他繼續服下去。在這個開始行憲的前夕，我想我們應探討我們所開了二十年的幾劑藥，究竟是否對症；我們所叫熟了幾個公式究竟能否達成提高行政效率與效能的目的。

在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妨與外國的情形之相類似者作個比較，雖則我們研究的對象仍爲中國本身實際行政的情形，因爲政治根本組織的方式固不能全學人家，東抄西襲，行政制度也得順應本國的環境人情，不可專憑外國的學理與成規。

一

討論行政改革最常用的一個公式是裁併駢枝機關。但是這個公式引用了二十年，中國的行政機構似乎越來越多，其間的關係也似乎越來越複雜。

所謂裁併駢枝機關，關係中央，省，縣三級的行政機構，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故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可供裁併。

我們可以先自中央政府說起。一般認爲現在行政院的組織太龐大，其所屬的機關應當予以裁併。行政院現在所設的部會比以前多，大家認爲這是一個不健全的現象，故主張調整歸併使其合理化。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央曾經對於行政機構作過一次很大的調整，那時一般認爲這個改革，頗爲合理。但不久中央的部會署又逐漸增加起來。二十七年一月的調整成立了經濟部，主管全部經濟行政，其下設有經辦全部國營工礦事業的資源委員會。不久農林行政事務由經濟部劃分出來，另成立了農林部。抗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又自經濟部提升爲直隸行政院的機關。在抗戰期間，水利也由經濟部劃出而成水利委員會，最近則又成立了水利部。抗戰以前原有衞生部，後來改爲衞生署，二十六年改隸內政部，數年後改爲直隸行政院，最近又改爲衞生部。抗戰以前，行政院裏沒有社會部，糧食部，地政部，這些都是新增的，司法行政部也從司法院又改歸行政院。以上所舉的不過幾個例子，說明在這不斷的調整中，這些機構都曾經多次的改變。但是部會署少的時候，我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也未見特高，多的時候也未見得便特低。這個公式用了許多年之後，我們現在也許已有充足的材料來探討這個公式本身究竟有多少價值。

二

據作者的觀察，中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之癥結似乎不在行政所直隸的部會署局之多少，也不在如部會署局所直屬的

機構之多少，或其所分的署司處科的多少。例如近來報載有人主張裁撤糧食部，認爲他是一個戰時的機構，現在已無用處。我們姑且不去辯論在此時期政府還應否向農民徵購糧食，或去研究糧食部過去辦理他的主管業務有無成績。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抑且是國際間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我們政府曾用最可寶貴的外匯到暹羅緬甸安南甚至於美國買米，到美國加拿大買小麥及麵粉，並到其他各地去買肥料。這是因爲我們的糧食不足，不能不買來接濟。我們糧食不足，一部分原因是若干地帶近去水旱爲災，一部分原因是國內交通工具被戰爭破壞而不能互通有無。但中國是現在缺糧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計口授糧制度的國家，還不但貽笑外邦，聯總運華的糧食也因爲我們沒有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流入黑市，造成糧食的投機，及予不肖官吏以許多貪汚的機會。再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糧食不但無缺，而且有剩餘可以出口，在這個世界糧食大恐慌的時期，我們更可由政府大量收購，輸出國外，不但可以換取外匯，並且可以造福人類，增進國際間的友誼。所以無論我們有沒有糧荒，在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中，政府絕對不能沒有一個主管糧食行政的機構，依照科學的統計，估計民食的供應情形，調節盈虛，並盡我們參加國際糧食組織的任務。一個有效能的糧食主管機關，可以統籌全面，不要等到災患臨頭時才圖救濟。這種措施可以挽救多少千萬人民的生命，減少多少國家財富的損失。比較起來，區區幾百個職員的薪俸是微乎其微的代價。

在抗戰期間，中央全會決定將內政部的地政司改爲地政署，近來又擴充爲地政部。那時便有人認爲這個決定也是增添無聊的駢枝機關，浪費國幣。但是土地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不但民生主義裏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應當澈底實行，中國全部經濟的榮枯以及全國財富的分配，都與土地問題有最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時候，諸如土地兼併的程度，自耕農，佃農和地主的比例，租佃的關係，我們政府以及專家學者似乎最多只有概括的認識，而無翔實可靠的事實可以作爲依據。討論的時候，只有引用金陵大學伯克教授及其他幾位外國學者的部分調查估計，其他似乎一無所知。甚至於我們對於幾個重要都市的土地分配也沒有詳確的材料。現在中共注意土地問題，外國人也注意中國的土地問題，但他們也是所知有限，不過用這些極端概括的觀念，或限於一隅的所見，而大聲吶喊。事實是立法的根據，我們的土地法在制定時便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因爲至今我們還不知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如何可以希望有賢明有效的改革，來完成民生主義的理想？如果我們的地政機關，能夠利用他的組織，對於中國全部的土地問題，有詳盡確實的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製爲妥當完善的方案，則事實勝於雄辯，地主土劣也不敢明目張胆反對或阻礙這種有科學根據的設施，至少也不敢利用我們智識的貧乏而信口雌黃，企圖保障他們既得的利益。我們設一個地政專管機關，只要能在三五年之內完成了這部調查研究的工作，全國的土地改革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充分的證明了設置這個機關並不是國幣的浪費，而是基本國策實現必需的投資。

三

我們不能相信中國的行政機關太多，因爲現代國家的政府的確是業務繁多，所負的任務委實重大，實不能不有相當專門的機關來完成政府的職責。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組織，比起其他國家來，即不以人口多寡土地面積大小爲比例，也是比較上最小的一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並未曾有什麼浪費。裁併駢枝機關因此並不是救治今日行政弊端最適宜的方案，這個公式似乎可以不必再用了。

中央政府行政效率與效能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在他本身層級太多。這一點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弊端，如果能在此加以改革，尙有良好的效果。

平常論中國政制的人大都認爲中國政治組織分中央及地方兩級，地方又分省縣兩級，合起來一共三級。這是一種只看表面，不看內容，而且是與事實根本不符的說法。

在外國人說來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各部合起來所組成的內閣。中國的中央政府却與此完全不同，因爲國民政府本身便分了許多級，各級間的關係與中央與省的關係簡直沒有多少區別。所以在中央政府作一種決定的時候，稍重要的事情便須有許多公文的旅行，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

且以當年隸屬於內政部的衞生署爲例。衞生署要辦一件事情，即使完全屬於他的主管範圍，也必須請示內政部，故須向內政部上呈文。內政部對於衞生署的呈文，也許加具意見，也許照轉行政院，又將上一次呈文。行政院收到之後，予以審查，然後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行政院討論通過，照正常的手續，即須送至國民政府，又是一次呈文。那時國府是不負實際政治責任的，所以又要送到中央政治委員會去核定。中政會於交付審查之後，將提出常會討論，通過之後，此案如果是法律條例，更須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又得審查，然後才提出院會討論，三讀通過，這件事情才算作了最後決定。決定之後，立法院不

能直接通知衛生署，而只能呈送國民政府，由國府令知行政院，行政院令知內政部，最後由內政部令知衛生署。這樣這件公文才在中央政府的內部作完了他的環球旅行，在每一站停下下來，少則三五日，多則兩三個月，每辦一次呈文時必須把前因後果詳細說明，附件再三抄錄；每辦一次指令時也得如此。這件事情如果是國家大計，所有的精力也許值得，但也許這件事情根本是衛生署主管範圍內極小的事情，也許只是衛生署長想添用一位秘書。而最奇怪的是這次環球旅行，完全在中央政府範圍之內，並不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據我們的觀察，全世界各國的政府辦公程序沒有比這種程序更笨重遲鈍運用不靈的。這才是行政效率致命之傷，這才是絕大的浪費。所以改革行政的第一步是在簡化每一級政府中的階層。

蔣主席數年前曾提倡行政三聯制以為改革中國行政的方案。這三聯制的演辭中，蔣主席曾提到所謂分級負責的原則。分級負責的意思是減少公文旅行時所要上下的層級，亦即是說衛生署有許多事情可以不必請示內政部，有的事情內政部可以作主，不必請示行政院等等。我們認為就目前的政府組織而言，分級負責是一個良好的補救方法，可惜過去討論行政的人沒有充分注意到這個方法，而致力於駢枝機關的裁併等等。但是根本治理這個弊端的方法仍在廢除中央政府本身的層級。依照法理而言，各部本是行政院的組成分子，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組成分子，其間原不必有上下級機關之分。有關國家大計的事情應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如屬行政事務即由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行政方針的事情應當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即由主管部長提出。純屬一部主管的事情應即由部長決定辦法，即予執行。部院與國府三者之間不必有上下之分，更不必事事上呈文下命令，因為部院與國府都是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本身應當是整個的，其中不應有寶塔式的層級。多少年來中國的行政制度受這個上下級機關區別的流弊而失却了效率，平空改制恐怕是積重難返。新憲法的實行我們希望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這是行政現代化的起碼條件。

四

提議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人過去多少年來也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其中之一也是設法限制省級的機構：省級機構限於民、財、教、建四廳，和秘書會計兩處。但是這數年來，受中央各部會不斷的壓迫，省縣兩級的機構也不斷的增加，在省為處，在縣為科或室，現在加的有地政、社會、保安、田賦、衛生、人事，統計等等的機構，農林部想在省縣內部增加的農林機構似乎尙沒有成功。提議改革省縣機構的人一律主張裁撤這些新添的機構，中央的部會則認為沒有這些機構他們的工作沒法推行。

據我們的觀察，省縣行政改革的重心也不在斤斤計較這些機構的多寡，或其分設與歸併。省縣兩級政府中也多少有本身分層級的弊病，但不如中央嚴重，故也不是問題的重心，雖則從前省府合署辦公，縣政裁局改科的兩個原則是應當嚴格實行的。

我們認為地方行政機構的問題在中央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究應如何劃分的一點。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是目前癥結之所在，必須有相當徹底的改革。我們認為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上述的一點是地方自治所以迄無所成的根本原因，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改，地方自治是沒有希望的，民主政治也始終無前途。現當行憲開始之時，這一改革應當以最大的勇氣予以貫澈。

在地方自治沒有實行的時候，地方的官吏，包括縣市長，都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內政部及銓敍部並且希望縣市長由中央考選分發任用。在他們看來，縣市長也是公務員，故應適用所有的公務員任用的法規。在地方官吏未曾民選以前，這個觀念也許尙可說得過去，但他是根本違反地方自治根本精神的，至少他只能是地方官吏民選以前一種過渡性的改革，用意在防杜省主席及民政廳長任用甥舅馬弁等弊端，絕不是所說的百年大計。民選的縣市長不應當是普通簡任的公務員，而應當是今日法規上所稱的「選任官」，其地位之隆應與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相等。他們不能運用文官制度下的任用法規。

二十九年中央開始實行「縣各級組織綱要」。這是蔣主席提倡地方自治最着重的一項措施。那時一般人對於地方自治並沒有一種正確的觀念。中央政府的各部會都認為這是注重基層政治的表現，而所謂注重基層政治便是由中央部會，用他們上級政府的威力，以監督自治為名，強迫地方政府担任許多行政任務。中央政府機關從前沒有能力辦的事情，現在都可實行新縣制為託辭，命令地方政府去辦。中央部會對於地方政府顯然沒有信心，絕對不放心讓地方政府有一絲一毫的自由。他們更不願見地方人民表露他們自由的意志。每一種行政，中央部會都訂有詳密精細的法規，由中央而省而縣市而鄉鎮而保甲，層層地命令下來。所以在地方上一個縣市長以及鄉鎮保甲長天天所奉到的是中央的命令，執行的也是中央的命令。他們可以拿着中央命令的招牌，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敲詐威脅善良的百姓，造成空前的紛亂與貪污。換言之，他們是中央的公務員，他們與地方的人民沒有絲毫干係，沒有遵循地方人民意志的義務，地方人民也沒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種情形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地方官治，是中央

集權而非地方分權。這是與新縣制的精神恰相反對的，而一切則以實行新縣制爲託辭。這是無知，這是狂妄。

往者可以不必追究，來者則必要改弦更張。現在我們的新憲法對於地方制度有了劃時代的決定。縣市長將要民選，縣市的自治事項上經憲法劃定。目前正是我們策劃將來大事的關鍵。

任職上級政府的官員，包括中央及省政府，在觀念上此時應有一番新認識。民選的縣市長將來不復是同他們部裏科長一樣的低級部下；他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公僕。對於他們，院長部長及省主席廳長並不能憑藉着官高而濫發命令指揮調遣。民選的縣市長的「上司」是縣市裏的人民，他們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大官不應亦不能再號令他們。在官階上縣市長是同部長們的頂頭上司——總統——同等的，雖則他們的範圍限於那個縣市。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縣市）自治事項是縣市長職權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的事情，應由地方自治，即由地方自行治理，不容上級政府干涉。在法理上如果地方政府超越了自治的範圍，經解擇憲法機關規定，地方政府應得其措施撤消。反之，如果中央政府侵越了地方自治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判定，中央政府的措施亦將因違憲而失効，縣市政府當然可抗不執行。這是地方自治的根本精神，中央政府今後自不能如以前一樣作威作福。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自治事項不多，亦即是說自治的範圍並不太廣。我們對於這種規定完全贊成。地方自治原是練習民主政府的一種方法，我們並不會希望用地方自治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有全國一致性質的事務當然比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爲多，且前者亦顯較重要，故中央政府保管許多大權是應當的，特別因爲中央政府也是民選的，且對民選的立法機關負責。

照我們過去的辦法，屬於中央政府的事務也由中央政府委託縣市政府辦理，稱爲「委辦事項」。在地方政府本是由中央任命的時期，這個辦法初無可非議，雖則中央委辦原與中央令辦全無分別，皇皇命令忙得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根本無力再辦自治事務（這是新縣制實行不良最大的原因）。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系然我國過去的經驗，及歐美各國的成規。深深感覺到「委辦」制度有極大的缺點。「委辦」和「令辦」本沒有分別的可能，既然「令辦」則執行命令的縣市長便多少失去了他們民選公僕的隆重身分，逐漸的變成低級的公務員，如同今日的縣市長一樣。他們疲於奔命的執行中央委辦事務，對於地方自治事務自不免荒疏，地方自治當蒙不利的影響。

我們經再三的思慮，認爲在憲法實行之後，「委辦」的制度應當根本廢除，而代之以中央自辦的原則。

這個制度的改革似乎是革命性的，好像我們從來沒有過中央自辦的經驗。但這也不盡然。例如征收所得稅一項中央職權，財政部自始便沒有委託地方政府代辦。然而這種事例不多，此處所要提倡的是所有一切中央政府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一律由中央政府設置直屬統一的機構散布在全國各地自行辦理。這些中央在地方上所設的機構既然有其固定的職權，受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他們不應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衝突，他們不相統屬也不致引起機關間的摩擦。

對於這一項改革可能的引起兩點反對的理由：

第一，有人必定以爲過去中央直接辦理的幾件事情並不見成效特著，有的反可弊竇叢生。上說的征收所得稅便是一例。我們絕對不否認中國的所得稅沒有辦好，但是我們也不肯承認如果這件事情委託地方政府去辦便會有更好的成績。試舉一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業，行總在各地設立了分署，直接發放聯總供給的物資。行總在過去受了中外的批評，也有幾件驚人的貪污案件。但是我們也很難想像，如果這五億三千五百萬元美金的物資，如果分別配給各省市去自行發放，有多少可以眞正送到應該受惠的人民，有多少會流到地方軍閥富豪的手裏，有多少會被地方官吏偷竊變賣。我們並不否認行總的成績不佳；但是我們有充足的經驗及事實使我們懷疑交給地方去辦便較爲進步。我想這個論斷不失持平。因此而認爲中央自辦不見得便完全不妥。中國的郵政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情，中國的電信事業亦然。我們的郵政，較之充滿了政治分贓氣氛的美國郵政顯無遜色。我們的電信事業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也掙扎出很好的成績來。如果中央所直接辦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們的效果，中國行政便可無愧。

這些具體的事例使我們相信「中央自辦」的制度是應當立即採行的。我們相信此一改革可以增加我們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我們更認爲如果提倡民主政治，推行地方自治，這是必循的途徑。因爲必須如此才能使民選的地方政府有力量來辦理地方人民所委他們辦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權責分明，隨時受地方人民的監督。他們不能以中央委辦之事多而逃避責任，尤不復能假借中央命令來魚肉人民。

至於中央機關有了自己的事業可辦，便不致於再以爲下命令便是辦行政，天天關起門來出新花樣，朝令夕改，治絲益棼。現在監察院和參政會可以質問交通部和行總，這兩個機關沒有一點方法可以逃避責任。但是參政會不能質問內政部，因爲內政部並沒有自辦的事業，他的施政報告的內容只是某日訂定某

種條例規程，辦法細則，於某月某日以某字第幾號訓令通飭各省市政府轉飭各縣市切實施行。如果省市縣政府不辦，內政部唯一的辦法只有再下訓令，叫他們辦理具報。參政會不能課內政部以鮮明的責任，因爲內政部本無事業可言。我們不容一個責任政府有這樣爲的逃避方法。

第二，必定有人認爲中央自辦的制度勢得添設許多機關，增加許多人員，是行政上的浪費。我們一方面不承認中國政府的機關太多，人員太衆；一方面則認爲實行了這個制度之後，現在的省市縣級機構人員必可大量裁減，總數未必劇增，而效率則可能有極大的改進。

談行政改革的人最常用的口頭禪，除了前面所討論過的裁併駢枝機關一項外，便是裁汰冗員。據我們的觀察，中國的公務員人數並不多，而是冗員大多。美國國會近來也在裁減政費，國務院的職員問起我們外交部有多少人，聽到之後就說此一數目萬不可讓國會知悉。美國的聯邦政府有二百多萬公務員，中國的中央政府只有二十九萬。美國國務院有五百多人專辦有關國際經濟外交事務；中國的外交部沒有一位職員專辦此類事務。比起現代國家來，中國政府的人員是世界上最少的一個，然而中國廣土衆民，在土地面積上是世界第三大國，存人口上居世界第一，在聯合國內是五强之一。以如此少數的人員治理這樣的大國家是事實上不可能的。

然而中國政府又的確嫌人員太多。我們政府機關裏儘有全無所事的人員，在那裏抽烟看報。同時，機關裏的所設人員，他們所辦的也多是上文所說的那些承轉的呈文與命令，並非與國計民生有密切關係的事情，眞正同人民發生干係的反而是那些不領國家報酬的保甲長。這才是中國政治上絕大的浪費。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中央及省政府並沒有多少直接由他們辦理的事情。他們所辦的只是紙片的「公事」，而不是具體的事業。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政府裏的層級，如上文所說，我們可以減少幾千的祕書，科長，科員，錄事。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委辦的制度，省縣政府當然可省去幾萬專辦承轉上峯命令的職員。這些人員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有志的青年，國家也費了許多金錢來養活他們，而他們所辦的是絕對不有實用的紙片公事，天天「磨桌子」，斲傷了他們青年的志氣。

我們應當利用這班有志有用的人才，將他們轉移到事業機關去爲國家辦理具體的事務。在事業機關裏，他們有發揮智能的機會，有求上進的刺激。郵政局打郵戳的職員是不可少的：他的工作對國家有貢獻。國民政府簽字蓋章的簡任祕書少幾個是無妨的，他的工作是未必需要的，他對國家的貢獻微乎其微，郎使他每天所蓋的圖章與郵局的職員所打的郵戳同樣的多。

現代政府所應辦的是事業而不是公文，不幸我們的制度只許上級機關辦公文而很少許他們去辦事業。一個政府內自然得有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但多數的機關是可以辦具體事業的。

至於那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他們的工作也不應當只辦公文。政府的施政係以事實爲根據的：政策方針以及法律命令都不應是玄想的結果。我們以爲在例行公文減少了之後，行政機關的職員可以調派去做調査考察的工作。每一個主管部門應當具有其主管事項最權威的事實，以爲施政的參考。內政部的禮俗司應當知道中國現在還有多少女人纏足，然後才能知道禮俗司所擬的禁止纏足法律會否生效。衞生部應當知道中國有多少人有肺病，然後才能擬訂防癆的計劃。這些材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的，但多一點材料卽加增了人類一點智識。辦理這件事的人對於國家的貢獻當較承轉一百件公文爲大。這才是現代行政的精神。

五

中國的行政有幾千年的傳統，不幸這個傳統已不能適合現代的要求。我們的行政機關是一架笨重不靈的機器，他的動力多半耗費於沒有實益的工作，費力多而成功少，費時多而效率低。今後我們的政府將爲責任制的政府，他的一舉一動將受人民代表機關嚴密的監督。政府每辦一件事情，訂一種規章，主持者要能向人民，代表機關陳述充足的理由，這些理由要有豐富的事實根據。政府辦一件事情後，要充分明瞭施政具體的效果，既不能盲目的發號施令，更不能不問號令的成效如何。睿智的人民是不容許這種行政的。所以對人民說，「本部奉令後業經通令施行在案」一類的「報告」，或「本部前經擬訂五年發展計劃分令逐步實施」一類的「計劃」是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的。如果我們的行政能在此行憲的時機照上述的新途徑發展起來，我想中國的人民一定甘願納稅來擁護這個政府，只要政府能多辦事業，多採現代行政的科學技術爲人民服務，多設有用的機關，多用有事可做的人員，人民是不會要求政府將其裁汰的。

卅六年十月廿四日，美京。

提高稿費（第十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二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八萬至十萬元，此啓。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孫克寬

中國今天的情況，無容諱言，正面臨着非常嚴重的局面。我們姑拋開滿天的烽火和嚇人的物價不談，祇要冷靜地分析平日所接觸的一切，便可以發現出種種的危機，令人思之不寒！這些危機，可以把它歸納為兩類。第一是國民道德的破產，第二是政治威權的消退；前者為主，後者為賓；前者為因，後者為果。綜括的病根是一個，便是政治問題。

先從第一方面說。首先發現出來的是陶孟和先生。陶先生本年六月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道德的危機」一文，他認為「中國一切的問題，乃是「道德崩潰的結果」，乃是「道德破壞的表現」。他舉出「最大的不道德是貪婪、不擇手段、畏葸、冷淡」，為政治的、社會的退步的原因。繼之而起的是黎照寰先生，他在六月十六日發表的「如何挽救道德的危機」一文，更分為治人與治於人的兩類、歷舉不道德的條目，為無公德心、無責任心，無比例意識，無配備意識。於陶先生所指斥的之外，又提出一種「嚴重的不道德為無信（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這真可謂剴切深至了！我現在從兩位先生議論之外，綜合現在的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吏的共同易犯的毛病，也有四點：

一、公私不分。中國人所受的儒家教育，本來最嚴於「義利之辨」和「名分之別」的。但在今天，這種教條已成「老生常談」的迂腐之論了。現在講究的是「因利乘便」，假藉權勢！那一個人掌握了一部份權力，便可以憑藉權力，解決個人一切的問題。民間的公司商號、經理人的應酬開銷和家庭食用、照例是公家負担，假口營業的需要，做自己的交際活動。許多人由商而官、由富而貴，便是這個訣竅。各機關的主管官，很少的人不叫總務人員「辦差」。報紙所傳：某銀行單付各董事的零賬，每月即在幾十億之上，幾乎公館的解大便紙，都要行裏開支。伍啓元先生在論中國經濟的文章內、常常抨擊過這變相的貪污」的情事，這些都是說明中國人公私不分的例子。

二、是非不明。由於國人的畏葸成性，辦理不精，同時「世故」的訓練與可怕的「暗箭傷人」，對一件問題、或一件公共事務之評價是狠難找到公道的論斷的。韓愈在唐朝的時代，便會概嘆過「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何況今日！我們的冤獄賠償法，至今未會制訂，學法的人引為憾事。其實即使制訂、如果一個絕無勢力的平民被冤枉，何嘗能夠獲得社會的援手！即使有仗義執言的人，依然有可能被誤會為「別有懷抱」。我們的處世箴言是「難得糊塗」，大家都糊塗下去，那裏有眞是非？

三、榮辱無關。中國人最不易得的是團體觀念。大之對國家，我們讀過魏德邁的評言，其間感到羞愧的究有幾人？大家都說「罵的對」！都以為罵的不是自己；而「貪污無能」與「失敗主義」者，是我以外的任何一人。政治頹敗，體面喪失，似乎與我個人不生關係！次之，在一個機關團體裏，祇有個人的表現，沒有相應的合作，甚至表現在運動場上，也還是個人英雄，不容易有團體的榮辱觀念，自然不易做到合羣互助。人與人之間，便只有一種淡然的輕蔑了！

四、不擇手段。由於上面的幾點，今天的中國人、是眞懂得「現實主義」的了。為了滿足個人的貪婪，不惜以種種的方法，來奪取金錢權勢。學生投考大學，已懂得如何請客運動看卷子的先生。商人做生意，不惜出高價的回扣，拉攏賺辦的官員。做官，求財，眞是用盡心力，無孔不鑽。犯法坐牢也不怕！寡廉鮮恥也不妨！市場物價的動盪，政治風氣的頹靡，社會論理的淪滅，皆「不擇手段」之一點有此致之！由此而發生「反淘汰」的作用，善良清白的人士，不是被擠到不能死不能活的地步，便被拖進渾水，自喪清白！如此，而還想見到健全的社會，豈非夢想？

國民道德的破壞如此，乃影響到整個的國家政治威權之不能建立。從來維持人羣秩序的條件，內在的為道德觀念所支配的良心，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有所愛惜而不忍做。如果這個藩籬破了，便是外在的社會紀律——法制來裁抑，懲一儆百，消弭禍患；或者奬進賢能，勸勉不肖。這便是「治世之徽權」，中國人所謂「政本」者是也！但到了不畏法、相率蔑視國家的威權，即使殺之不可勝殺，維持之術窮，整個的局面，便要動搖了。我所看到的國家威權的減退，有以下的幾點：

第一，命令效力，勝於法律！國家的政體，無論其為何種形式，總有共同遵守的法典。行政力量的源泉，原寄存於法律，一切行政的命令，祇能為補充

推行法律的工具，斷不能代替法律，或者超過法律的效力，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我們從討袁護法以來，所爭者即此。此之所謂法律者，必需最高政治機關所承認，合法的議事機關所商決。在訓政時期，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是循着政治會議或黨全會所招示的原則，戰時是國防會代替此權，但經過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政府無故不能延不公佈，抑且不能另頒代替的法規。我們如果循着這個原則來考察現在的政治現象，必然會遭遇到邏輯上的困難。舉例言之，一部關係地方制度的大法：「縣各級組織綱要」，便不爲立法機關所同意，至今猶在施行，反之，縣組織法這一套法律，却爲着「牴觸綱要」而停止作用。再如省政府組織法，立法院最後一次修正，到今天仍未公佈施行。現在各省政府的組織，是以訂立合署辦公細則的方式，經行政院的批准而有效，這兩種法規與人民的權利義務，有多大的關係！共在法理上的效力如此，可概其餘了。中國各級政府的政令推行，隨時隨地，都有「二元化」的形勢，隱存於法令之外，必有一套命令在那裏，法令爲得不紛歧，人民何從來抉擇？

第二、人事運用，超越制度。就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所頒佈的法典來看，制度的樹立，確有規模。可是實際情形、仍是寓人事運用於制度之中。最顯著的如主計制度和人事制度，姑不論超然獨立，是否爲行政原理所許可；即以本身規定說、似乎也與各級機關，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但今天止，這兩種制度的人事，還是與行政機關主官，脫離不掉關係，人事是「密荐明派」，工作是「奉行意爲」，以法令來彌縫事實，實例正多，不勝枚舉。再像選舉指導的辦法，更說明人事的運用是如何的重要。制度不能保持客觀的地位，即使樹立起來，亦所謂「具文」而已！

第三、地方疆吏，寵過遇隆。我們的政治，形式與內容，迄未一律。以法令的形式看，集權的彩色甚濃，地方政府，好像事事受到拘束。張君勱先生，爲此曾發表感想，認爲地方無權，不能做事。但實際呢？疆吏之權，實非想像所及，簡直超過前淸的督撫。在單一國家裏，通常人事權是握於中央，前淸的吏部，便掌理天下百官，督撫只有調劑權，參劾權，並無用人權。所謂「黜陟大權，歸之君上」者是。現在各省政府改組，那一次不是先發表主席，而後由主席來推荐委員和廳處長？行政院曾訂有各省長人選審查辦法，只不過形式上的手續。勝利後又頒佈了一個吏治改進辦法，也還是一個具文。疆吏可以自用同僚，委員制便成了獨任制，把地方團體的權力，輕輕地移轉到個人手中；這是一。其次用錢。財政與預算久已脫節，地方疆吏於向中央討價要錢之外，還可以自籌行款，省營企業，便做一個人外政，而無法稽查。人民負担，可以一紙命令而增加，如某省的「戶養保，保養鄉」的辦法，增加人民負担，不可數計。各省此例甚多，名爲省府決議，實則首長一人的決定；這是二。關於成績的考核，僅僅有一個「政績考核辦法」，也只能列舉細故；大政策的成敗，私人行爲的違法與否，沒有機關能够認眞的考核獎懲。我們倘能統計各省人民控告地們本省大吏的結果，與監察方面糾舉彈劾的下文，便可以發現有千錘百鍊而祿位依然的「不倒翁」在這裏可以說明疆吏的地位如何重要，和今天國家賞罰黜陟的大權，是多少打點折扣了！

第四、社會豪强，力量雄厚。中國古來施政的格言是「無侮鰥寡，不畏强禦」。政治本來是保護弱者，求得一個公道。可是在今天便很難說了：固有的封建意識所產生的集團或人物——都市裏的閒人階級，鄉邨裏的紳士羣——聯合了新興的暴利既得階層，便成了特殊階級，和政府的法令與人民大衆的願望爲難。民主政治基本要件之一的普選，在四川便成了「炮選」。上海社會對政府某種法令的推行，如果不得到幾位先生的點頭，便很難通過，港粵的走私問題之嚴重，與久而未絕的煙禁，在在均說明這個陰影的存在。「日出」中的金八爺，到處都存在着他的威脅！這樣下去，法律的執行，便顯然有個差別。號稱民主的國度，公然有一大部份無告之民。在施政者，仍然利用了這些旣成力量，獲得一些便利，其在威信上所付的代價，便無法估計了。國民黨革命的目的，本是打破政治與社會的不平等；和這些特殊力量，本是對壘的，現在却面向他低頭，實在是矛盾的現象！

以上四點之外，再有一點便是善良份子，在今天的社會裏，幾乎不能存在。首先是生活的壓迫：社會的酬報，不能與眞實的價値符合。辛勤終歲，爲國家社會效命的，如學校敎師以及守法的公務員階層，無法專心致力於本業。更進一步，以金錢來決定社會身分，使淸貧淡泊之士，仰豪紳大賈的鼻息，受盡揶揄，予後進靑年以相反的示範，因之敗壞政風，從而加重國民道德的破壞。復濟之以上述各點現象，政治威權，無怪其日見消退了！

中國今天並未全般進化到工商社會，經濟的條件尚不足以決定國家的存亡。所怕的是以政治助長經濟的危害，復因經濟加深政治的危機，才眞是無可救藥！現在不幸已兆其端。如果不自政治的環節上，倒轉逆勢，其他皆是徒勞，改進政治的途徑，必須自上述兩大「根本之圖」上下手：

第一、施政的觀念，須有澈底的變更。我們本是奉行儒家哲學的，那末更澈底的奉行好了。國民道德的養成，視於政治的示範。中國人施政，向來注意「移風易俗」「推已及人」，如何能「厚風俗」呢？首先得要拋棄個人功利的

要求，爲全體遠大的前途幸福着想。以誠破虛，以拙濟巧，用樸拙的實踐之士，離開縱橫捭闔的策士之流，這便可以阻抑住宦途的徼倖之風，也可以糾正過社會上的投機取巧的傾向。漢武帝退級黜而用公孫宏，才給方術遊說之流開了路，不免輪意之一海！唐太宗用魏徵房杜，不聽封德懿的當面阿諛，才有了比美堯舜的「貞觀之治」。「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人心」，今天想來，還有道理的！

第二、公民的教育。風氣的轉移是無形的，還需要健全的公民教育。這裏所謂教育者，並不是「說教」，而是要躬行實踐的教育來實施。「謹庠序之教」必濟之以「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如果讓教師在飢餓線上掙紮，讓學生在課堂裏的同情憐憫，還不如不設教的好！生計與道德，非並重不可。於此有特別要說的，職業的訓練專家，對公民的德智教育，並無裨益。還是讓眞正爲人師表的先生，回到教育的崗位上，教育才有辦法，社會才可示範！

第三、是公道的政治。我們認爲國家是超階級的，政治是執行全體人民的意旨，均衡各階級的利害的，我們必須走向「公道的政治」一途。所謂「公道」的條件：一是「法律前面一律平等」的原則，須嚴格執行。司法超然的態度，更須絕對保持，一掃政治上社會上的特殊階級，違法敗紀的行爲！二是政治的客觀標準，須共同一致遵守，孟子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民是政治服務的對象，憲法是政治措施的準據，此外再不容有畸輕畸重的標準存在，應幾法治的規模漸能樹立。三是善良份子須有保障。政治上用人的激濁揚清，工作報酬的切合生存需要，社會地位的提高與保障，使職務的自由（公務人員，在法令範圍內，應忠實執行其職務，不受外在的人事的干涉，）與學術的自由，可以保持，而後理性政治與科學的社會纔有實現的可能。

第四、是地方權力，寄存制度。前面所據的第三點病態，並未意味着不贊成「擴張地方權限」，相反地，我是主張國地事權，更要從嚴劃分，充分發揮自治的效能。不過要權力寄存在自治團體中間，自治團體的活動，依據於國家法律的制度，決不應容許以首長代表地方，以地方自治的權力，掌握在主席或者「省長」的手中。政治的措施，聽命於議會，人事的進退，聽命於人民選舉和考試甄試的制度。割據與封建的意識不容許存在於現代的中國。在過渡的階段，不妨修訂一簡單易行的制度，如「吏治改進辦法（行政院上年七月間公佈）之類，由法定的部會嚴格執行，以矯現在的「人事運用」的現狀！

當然，改進政治的辦法很多，這些也不過是卑之無高論的常談，可是國危人禍，至於如此！不在本身上想法，何能挽救？在人治的局面未改進，政治還是要自上而下的今日，我們還是以這一點的熱忱，作一次微弱的呼聲吧！

卅六，雙十節後四日，南京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蕭公權

中國今日的教育呈現着種種的矛盾：國家感覺到建設人才的缺乏，但大學畢業生却遭受失業的威脅；投考的學生惟恐不能錄取，甚至舞弊以冀徼倖，但在校肄業的學生却有許多不肯用功求學；尊師重道的口號隨時可以聽到，但當教員的不僅生活困窘甚於苦力，而且有時還會被學生毆辱傷害；政府用種種方法去提高程度，肅整學風，結果不堪教的學生，不像樣的教員依然溷迹於校中，程度學風反有低落的趨勢；教育當局直接或間接地設法管制思想，而學校中思想之龐雜似乎有增無減。這不過舉其大者。仔細探索一下，恐怕「南轅北轍」的現象還不祇此。在千矛百盾圍攻之中，中國的教育縱然一息尚存，却已經是體無完膚，缺少生氣。

要解除矛盾，誠然不是一朝一夕的措施所能見功。教育裏面的矛盾實在是整個社會矛盾的反映。雖然治本的辦法一時談不到，我們儘可先着手於治標，以救眼前的危急。

第一，要立刻寬籌教育經費以大量充實學校設備，充分改善教職員生活。今日財政的困難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再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誠然是火上添油。然而政府並不因爲財政困難而避免動員戡亂。政府認爲不努力戡亂就不能够安定政治，所以，就是要開支天文數字的費用，也不可不辦。但教育是否也重要到同樣的程度呢？政府的看法我們難於確斷。照國民的眼光看來，教育的絕對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教育是造就人才，保育國民的工作。是一切建設，政治安定，社會進步的本源。國家的大政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

退一步從安定政治的消極理由來說，教育的危機也必需迅速挽救。因爲教

育經費不足，弄到學校設備不充。教師的研究工作固然停頓，學生的讀書興趣更難於鼓起。物質生活的壓迫不必提，精神的苦悶無形中造成學校當中不安的心理。聚成千成百的「知識份子」於一處，使他們的生活貧乏而苦悶，使他們的心思精力不能集中於學術，其結果就難免會向着學術以外的方面去活動。

物質生活的壓迫也不容忽視。在抗戰期間，教職員的生活雖然痛苦，他們却不曾口出怨言。因為知識份子無不擁護抗戰，認為個人受些磨折是應當而值得的。但是他們對於戡亂的看法却大異其趣，如果政府對於教育的危機不甚關心，依然為「軍事第一」的看法所蔽，其結果是相當危險的。

教育本身的安定也值得考慮。照以往的經驗看，一般學生對於他們的教師頗能尊視。然而近年教育破產的現狀似乎造成了師道破產的現狀。少數蠱惑學生的教員不必說，就是誠心指導學生向學的教員也苦於威信之低落。他們勸學生專心讀書，學生也許反問他們有多少圖書供瀏覽，有多少儀器供試驗？何況學生看見教員生活的窘態，縱然同情，下意識却難免輕視。「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一部份的學生既然根本瞧不起窮教員，無怪乎在他們認為必要時就會飽以老拳或刺以白刃了。學風由何而純良？學校由何而安定？

年來政府用於教育的經費不過佔總預算百分之五上下。這比較用於戡亂軍費者必然是一個很小的比例。政府為什麼不可以把教育經費增加到憲法所定百分之十五的最低比額呢？為什麼不可以縮減其他次要甚至不必要的經費以裕教育呢？縱然預算無從縮減，為了搶救教育而小有增加也是十分值得的事。否則照現在這種情勢推演下去，筆者很懷疑將來我們能有多少可用的人才以擔當建設的責任。

第二，要改換現行的畢業證書制度，以糾正一部分學生對於教育的錯誤認識。從社會的立場看，辦教育的目的在培植人才。從個人的立場看，受教育的目的在發展知能。畢業證書的用意在證明個人學問的造詣，以便社會分配適當的地位或工作。如果個人眞正得着了學問，證書確實表明了造詣，畢業證書誠然是一個有用的制度。然而在中國現今教育出軌的情形之下，這個制度已經成為一個用少弊多的形式主義。學校多數內容空虛，學生程度普偏低落，各級教育已經不能達成培植人才的最高目的。「畢業」云云，不過表示一個學生住校若干年月，修習若干課目。是否得着了按照標準應得的學識往往大成疑問。政府却依舊注重畢業的形式。升學投考要證書，文官考試要證書，銓敘就業要證書。有了證書未必有出路。加上「特殊關係」纔可以有把握去解決許多就業的問題。個人的學問能力有時候還是次要的因素。但是沒有證書却很難有辦法。流風所播，使得有些青年人忘記了學校是求學的場所，而把它看成博取資格的必須途徑。「畢業」和畢業證書成了他們進學校的主要目的。學問、興趣、服務，幾乎全成了裝點門面的空話。商學經濟學的出路寬，就羣趨商學院與經濟系。法律司法的出路穩，就羣趨法律系和司法組。教育政治的課程比較容易混，就羣趨教育系和政治系。生物物理的考生少，比較容易取，就投機報名，冀圖徼倖錄取之後設法轉系。在學校裏打聽那些教員的功課易，給分寬，就儘量選修他們所授之課。教員如果給了「不及格」的分數，那就是阻擋個人的出路，非向他理論，哀求或拚命不可。到了四年期滿，用功求學的學生與混取資格的學生一齊畢業，同得證書。這樣的證書那裏能夠作為正確可靠的學識造詣之證呢？何況證書偶然間還有僞造的呢？

這種已「畢業」而未必有學問，得證書而未必該畢業的弊病，教育當局不但知道，而且曾用若干方法去改善防止。中學會考，督學視察，審核教員，證書部發或驗發，招生報部或報驗等等都顯然意在整飾學校，使其符合培育人才的目的。然而因為環境困難，執行未當，所收效果實在不豐。這些防弊的辦法本身也受了形式主義的侵蝕。

要想改正觀聽，使學校眞能發生教育的作用，必須首先打破形式主義，必須廢除徒具形式的畢業證書制度。（一）各級學校，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祇容納合格的學生分科修業。「畢業」與畢業證書均予廢除。（二）規定一個最多的肄業年限（可參酌現行各校畢業年限略予延長，例如中學八年，大學六年）。逾限以後，無論成績如何，必須離校，以免久佔學額。（三）教員平時可給予習作及考試成績，以供學生自己參考，使其知道學業的進度。一切成績概不對外發表。（四）小學可按普及教育原則，免試入學。中等以上學校入學則須經考試合格以後方准肄業。中學入學考試由教育廳會同公私立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各校教員中妥選。專科以上學校，入學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專科及大學教授中妥選。學生報名時就願入之學校中塡明第一、第二、第三志願。錄取後按各校學額及學生成績分發。（五）招考學生由各校分別彙集報名。學生自問能力充足，可以向本人肄業之校申請。但為避免濫請起見，可限定升學報名之肄業最低年限（例如報考專科以上學校應在中學肄業滿足五年），並規定每生在初次報考失敗之後，可於此後三年以內再行報考兩次。如果還不能錄取，此後不得再考。（這樣的學生應當轉入他

途。）（六）大學修業生可申請參加文官考試，研究院考試，或「學士」學位考試。研究院肄業生，滿足適當年限後，可參加文官考試及「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由教育部聘請合格的專家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這些考試的報名，仍由各校彙辦，不要學生自己的證書。（七）學位考試合格的人可以發給證書，但不作爲銓敍，就業或任何其他考試的證件。政府或社會機關選用人員，憑考試成績及服務成績以爲取捨標準。「學歷」祇能看做個人求學經過的記錄，以備參考，不作爲鑑定「資格」的證件。——以上所說，不過是幾個要點。詳細的節目，當待研究。

廢除畢業證書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促使學校成爲純粹的治學求學機關。想借證書爲就業敲門磚的人可以絕迹。教員與學生可以在學術的立場上相見。好教員可以發生影響，得到尊敬。壞教員難於立足，終久會被淘汰。分數的寬嚴不是重要的關鍵。教員有學善導，學生好學勤修，在參加各種考試的時候自然可以見長。反之，縱然偶爾有少數徼倖得售，大多數必難徼倖。其次，空虛騖弛，「誤人子弟」的學校，久了定然無人上門。（證書制度無形中替壞學校拉生意。）不學無術的教員也不會有人請教。私立學校祇能靠敎出來的學生考試多能獲售而存在。反之，多數學生成績不佳，政府縱不勒令解散也自然難於維持。公立學校的主持人也可以按歷年學生考試的成績而分別獎懲。學校當局聘請教員也不敢不儘量認眞。督學視察，教員審察，中學會考一類的麻煩手續儘可免除。因此政府對於學校的監督可以不費多事而收到實效。其三，這個辦法施行之後，中學（尤其是大學）的學生數目可能因混資格者的裹足不前而減少。這並不是壞事。而且還可以略略減經教育經費不足的困難。

這個建議似近荒唐而確有根據。它是中國往昔考試制度以及近代學校制度的參合。它也是孫先生考試制度原則的擴充應用。我們何妨把它試行一下呢？

西歐紀行：（三）義大利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記者從法國經瑞士穿過著名的桑伯隆隧道而入義大利。瑞士的幾天就擱，使對義大利的印象，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愈覺得相形見拙。阿爾卑斯山在這裏劃界，一邊是安定，整潔，富足，一邊是紊亂，骯髒，貧窮；一邊是戰時中立，戰後繁榮，一邊是戰敗國承受着自作的禍孽。從邊境到米蘭的路上，同行者有一位中年的義大利人，據他說他曾在齊亞諾手下做過事。他不願意表示現在的身份，看去似乎在經營什麼買賣。他用法語和我談天。起初他表示戰後的義大利，到處是破壞和貧困，再因政治的不安定，短時期內不易恢復元氣。接着他便追述戰前的情形，政治如何的上軌道，社會如何的安定，人民如何的滿足，一切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功績。沒有墨索里尼，不用說許多現代建築•新式工廠不存在，即是人民在馬路上行走也不知道先後左右。他異常正經地頌讚過去的首相，車過史脫拉隆，他指着湖邊的一座房子說：當年四巨頭會議即在那裏舉行的，言詞中頗有今非昔比的感嘆。這樣的人我以後遇見了好幾個。他們都非常直率地說過去的首相爲義大利做了多少事情。祇要我們對現狀稍表示一點不滿，他們便解釋：「以前却不是這樣的啊！」這一種極端反動的心情在法國是少見的。一則因爲法國的民主基礎堅實：一般人民的生活也比較寬裕，再則，維持偏安的貝當既遠不如曾赫赫一時的黑衣宰相，而解放英雄戴高樂以國家爲本位的獨裁政治尙未生根。

在另一方面則是左的極端•共產黨之懷恨墨索里尼，不自今日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自始即不兩立的。二十年來共產黨在法西斯政府的壓迫之下，備受痛苦人。一旦獲得解放，報復心的迫切，可想而知。何況在戰敗以後，人民生活艱難，而政權却又落入右傾的基督民主黨之手？

兩年來義大利共產黨在政治上遭遇和法國共產黨頗有相似之處。法國共產黨在內地抗敵運動之中出了很大的力，受了很大的犧牲，義大利共產黨也是如此；法國解放以後，戴高樂和內地抗敵份子合作，邀請共產黨共同組織政府，義大利解放後的情形也復如此；法國共產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義大利共產黨在去年的大選中也獲得了最大多數之一的地位；法國共產黨因與執政的社會黨右黨及天主教黨意見不合因於今春被排出聯合內閣，義大利共產黨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再加上這次華沙國際會議，除蘇聯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的六國外，便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

法國是戰勝國，義大利是戰敗國，在國際地位上似乎應有很大的差別。然

而事實上不然：義大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增高，而且出乎意料之外。例如和約國簽字，史芳璦外長在巴黎的十六國會議中已，英法美重視義大利不亞於重視法國。外長並肩於西歐頭等國家之列。這自然是靠英美的提拔，由此而看義法共產黨不謀而合的發展和遭遇也是極其自然的。

目前義大利的執政黨基督民主黨相當法國的天主教黨，溫和保守，維護既得利益，在外交上親英美，也正因為親英美，所以該黨領袖加斯泊利能再三的組閣。義大利的社會黨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同樣內部分左右兩派，因為這一分，本身的力量日見薄弱，這本是一般現象。然法國社會黨兩年來還能在左右兩大黨之間折衝，發生相當的作用，雖然不過是過渡的調解，而義大利社會黨連這作用都沒有。華萊士今年五月間在巴黎演講說西歐政黨的傾向和出路是社會主義，而且是偏向於英美式的民主。他接着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可以共存共榮，祇要各方執政當局能開誠布公之解決一切問題。我同意華萊士的意見，但看目前的情形，大陸上都在開倒車，到社會主義之路，尚很遠長。最有希望的是英國。但在這樣反動的歐洲政局之中，英國的社會主義即使成功，也不過是限於狹義的帝國以內，對各民族共存共榮，恐無大裨益。

政治上雖然不安定。義大利兩年來的復興不能說不快。美國人的幫助也眞是無微不至，從政府借款，救濟總署接濟以至於退還德軍擄去的存金等，用種種方式支持着基督民主黨的政權，並且還有軍隊駐紮，為執行的保證。

誠然，義大利全國的交通幾乎都恢復了，破毀的橋樑有的已修好了，有的正在重建，許多工廠已經開工，破壞的房屋許多在修理，例如世界著名的米蘭的史卡拉歌劇院戰時被炸毀壞很大，現在美國人願意單獨拿出一筆錢來修建。但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儘管在那裏做，人民的不安卻一天甚於一天。少數人發了國難財或經營大黑市飽了腹，享受奢侈的生活，直接間接受政府的保護，公教人員和工人則受到日益嚴重的經濟壓迫。一個普通工人每人一萬里爾左右的收入在羅馬米蘭等地的大飯店中祇能換取一頓盛宴。可是到過那些大城市的人，對於一餐數千里爾的食客竟如此之擁擠，都覺得非常驚奇。

但無疑的義大利一般人民是窮了，無論在政治中心的羅馬，工業中心的米蘭，或最吸引遊客的佛羅稜斯和威尼斯，大多面帶菜色，精神衰頹。因為政治上的不平，經濟上不能滿足他們最低的要求，他們對於工作漸漸鬆懈，對於生活漸漸失望。因此有的便想念過往，有的憧憬將來。這是共產黨活動的機會，而在另一極端卻形成了所謂半法西斯的集合。其實大多數人對於政治和主義並沒有興趣，他們偶然的極左或極右，同樣的祇為了想獲得較好的生活。

美國的援歐動機原是好意，但在義大利和法國的做法太不聰明。兩年來的成績把中間的勢力壓倒了，讓左右兩極澎漲。這也許不是美國的私願，但現實是如此，如要故意把歐洲開倒車，退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封建社會，或把它一跳提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像目前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兩者都是夢想，嘗試的結果，不敢預料，然終非歐洲之福，也非美國之福，這是可以斷言的。

（全文完）

（上接二頁）其他大部均被摒於門外；而青年軍以一紙命令即可入學讀書，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二）大學為國家人才培育之所，在學術上有其獨立與崇高的地位，其發展不容受外力干涉。今政府以其政治的力量威臨學府，保送青年軍入學，對大學教育的尊嚴，實是一種莫大的侵犯！

（三）青年軍未經考試即進入學校，這其中自然難免良莠不齊，因而影響學生一般成績的水準。

（四）不合理的待遇使一般青年對政府的作風心懷憤懣，無形中打擊了政府的威信。

因此政府應該毅然地取銷這種保送入學的制度。若說青年軍有功於國，則政府可以其他種種方式酬勞其功，而絕不能以大學數為酬功的物品。且曾有功於國者除青年軍外尚不知有多少，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何況大部份的青年軍都只受優待，而未曾於抗日戰爭中發揮其戰鬥力量。若政府必欲維持此種制度，則在一般人心目中必認此為政府維護特權階級之又一證明而已！

陳榮緯　十月廿九日　武昌

在美國的煩惱

編者先生：我們到美國後，感受許多煩惱，現在擇要報告，以供後來者的參考。我到紐約的第一天，以每天七元的房租住在一家旅店裏，而且要一次付五天。但在同一樣式的房間，住一個美國人，他每天只付三元。請旅店伙計到街上買四塊三文治，一瓶牛奶，要我三元，但實價目僅值一元左右。還要付小賬，二毛不夠，一定要三毛，論起價來。有一次到餐館裏吃飯，遺了一個皮包在櫃台旁，內有一百四十元，鋼筆及文件等，一會兒回去找，掌櫃說並無所見。到一家鞋店去買鞋，有一雙自己覺得特別滿意，看了又看。老板說只剩下一雙了，不能賣出。滿懷失望，步出店門。但他又招我回去。說假如我眞要的話，需多付三分之一價錢。到襪店裏買襪子，有一雙標明了價目是一元二毛，但女店員卻索一元六毛。到理髮店理髮，要付一元八毛，而實際價目是六毛至一元左右不等。……後來我註册搬進了學校宿舍，但學校不包膳食，祇好到中國餐館裏去。起初我以為是自己人，總要好一點，但結果因為我點不起大菜，仍然受着侍者們的冷眼，奚落。

溫典光　十月廿一日　紐約哥命比亞大學

關于「火車要人推」

編者先生：頃閱十月十八日貴刊三卷八期所載蔣家丁先生的陝甘遊觀「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亡」一文，末段「火車要人推」，說「寶天鐵路全長一百四十公里，要走兩晝夜，有時上坡，（下接十四頁）

國軍全盤戰略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東北共軍發動六次攻勢，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但是雙方還沒有主力決戰。很快東北要天冷了，軍事行動上不能說沒有妨礙。但東北糧棉及交通的困難，國軍的向東北增援似乎已經到了飽和的程度。陳總長決不讓共軍再有七次攻勢的雄心，將來也或許像「三月打通平漢津浦」，「半年底定關內」的雄心一樣的會推歸幻滅。同時，看情形，共軍在東北的六次攻勢，除破壞一部分工礦以外，不會有大作爲了。這也就是說，國軍似乎有把握『粉碎』共軍六次攻勢，但是七次攻勢是不是還有呢？自稱不願多作預言坐在東北行轅辦公室裏患着胃病的陳總長，目前他也一定判斷的清楚，還倒用不着去問林彪。

在關內晉冀魯豫的共軍是南移了。伏牛山大別山兩錯威脅着中原，膠東半島也還沒有肅清，陝北共軍曾傳一度突入延安，榆林近郊亦已鏖戰多日。粵桂邊境有大規模清剿，鄂南通山大沙坪也有戰鬥，江南澄虞地區不清。在共軍不斷的向南發展中，國軍以全力北來爭取東北一隅之短長的戰略是値得攷慮的。一方北來，一方南下，只有一時的遭遇，沒有主力會戰！沒有主力會戰是解決不了軍事上的問題的。國軍過去及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軍事上能有一個整齊線，劃分前後方，獲得前方勘亂，後方建國的機會。但是目前這種形勢，大後方有變做大前方的可能，於是國軍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全盤戰略了。廬山南京的兩次重要軍事會議，無疑的將要對全盤新戰略有所決定。這兩次會中獨小陳誠總長參加，國軍全力爭東北的計劃，或許會變更，傳陳總長日內或將自瀋飛京，著一著由蔣主席親自主持所決定的新方案。

南京電傳政府爲指揮晉豫鄂皖軍事，將在鄭州設立主席行轅。記者在本刊上期「八方風兩會中州」一文中曾談到中原指揮機構的需要調整，以應付共軍的兩錯對三點一線的力，歷現在似乎漸臻具體。從鄭州將設行轅這一個消息看，可以看出政府對中原戰事要開始注意了。壯士斷然可以斷臂，而華中及中原是心臟，腹內的迴蟲須要趕快治療，不然外援吃進以後，並不能增加營養，黃油麵包吃到嘴裏，並不能長在身上，結果還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孩子。或許當局在考慮要是斷臂，還是斷東北或西北，心臟是要保護的，迴蟲是要治療的。就是不談「心」與「臂」的分別，起碼也要盡力做出一條整齊線來，分開前方後方，形成一個戡亂建國的有利形勢，不然在對內對外觀瞻上也不好看。

政府重新考慮的全盤戰略，事關軍事機密，外方無由得知，但衡以目前軍事形勢也不難尋求其軌跡。以後華北天冷了，軍事行動有些不便，政府人員也一再說接收東北是外交問題不是軍事問題，打下去問題複雜。這意思也就是說，關內從長江到黃河是內政問題，倒可以任手的來打。同時在國軍軍事接收東北之初，政府中也有人不甚贊同，認爲應當專心注意關內。嗣後共軍在東北幾次攻勢頓挫時，也有人主張適可而止，抽兵進關，所以曾經傳出國軍將放棄東北的謠傳。

嚴冬東北軍事凍結以後，國軍可能全力掃蕩從黃河到長江的地區，一方面壓制共軍向南發展，一方面重新計劃平漢津浦之打通，美方的「救濟糧食」年底可以用完。雖不直接用於軍事，民糧增加了，軍糧自易籌劃，打油的錢省出以後，自然可以多打鐵。糧食問題解決後，也許以後還有交通器材的援助，交通器材，也可以說，只爲中國人民，不爲中國內戰。但是鐵路公路修好，水上運輸加强以後，誰又能禁止不准作軍用？

河北平原始終不是主戰場，雖然地位衝要，但始終作爲北方的一個配角。察綏有事時平漢路被破壞，東北有事時，北寧路被破壞，山東劇戰時，這裏也限於兵力不能策應，年來十一戰區及保定綏署的任務始終是確保平津保石唐等重要城市及交通幹線及港口工礦地區，在軍事上雖然有過幾次戰鬥，多半是附帶的。聶榮臻與李運昌出沒破壞鐵路交通，保定綏署在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兩股共軍和策應東北察綏及山西。鐵路屢破屢修，屢修屢破，損失相當重大。平漢路北段自去年九月廿九日起到現在前後經過七次的大破壞，至今石門已孤，平保還是不通。上月共軍再攻徐濟，石門守軍第三軍羅歷戎率第七師李用章全部十六軍的一個團和軍直屬部隊，馳援徐濟，在望都南西南舍附近被共軍包圍，全軍覆沒，這是河北國軍最大的一次損失。據說共軍在徐濟也死傷近萬，被俘千餘。過去的姚村戰役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戰鬥，其規模均不爲外傳之大，去年冀東掃蕩也不曾有過一團人以上的戰鬥。今年六月十三日共軍的襲取滄縣，國軍地方團隊損失在七八千人，津南的地方幹部也有重大損失。年來河北境內的戰鬥不過如此，比起東北山東乃至陝北察綏，都算不了什麼戰爭。

國軍如果再計劃打通平漢津浦，無疑的河北將爲主要戰場，楔入東北的國軍在東北凍結以前，仍然是要以瀋陽爲中心，控制冀熱遼邊區，使東北華北聯成一氣，以守備所餘的兵力調進關來，策應平漢津浦之戰，在北國冰封的時候，還是很有可能的。以全局論，共軍發動八月攻勢已經有兩個月了，南進千里，兵力分散，補給困難，國軍或許在他攻勢間歇的期間，在關內發動一個全面的反攻，到來春天暖，再進兵東北。這種新戰略的考慮，或許已經有多人同意了，看陳總長晉京後他的意見如何。

十一月十日

（上接十三頁）機車無力拖拉，乘客得下來推車，第一天通車，火車進站，觀者大恐，說是眞龍出現，相率逃走……」確與事實相差甚遠。查寶天鐵路，由寶鷄至天水北道埠之天水總站，正線全長一百五十四公里，原作者所云一百四十公里，實屬錯誤。通車之初，規定行車時刻，全程爲二十小時，誤點間亦有之，然絕非每次均行兩晝夜。該路因工程艱巨，戰時趕工，坡度較大，復以機煤欠佳，列車上坡緩慢，旅客可以自由上下，有人以手扶車邊，故作推車狀，則係事實。其意只在遊戲性質，豈眞人力可以推動整列火車前進耶？又該路鋪軌完成，第一天鋪軌隊列車進天水站，附鄉數十里民衆，趕來參觀，路局方面，派卡車十餘輛，往返車站與市區間無條件接送天水民衆赴車站觀光，全體員工，列隊歡迎。當機車二二六號拖車箱十節，滿紮旗彩，駛及可望見站房時，汽笛大吼，爆竹與掌聲雷動，萬頭攢動，爭相觀瞻，何云「觀者大恐，相率逃走」？未免渲染過甚，而把甘肅人民說得太愚昧了！

王多幹　十月三十日　甘肅定西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吳有訓出國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中大通信）中大校長吳有訓已於十月二十三日離校，現已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會議，吳氏爲何被派出國？返國後是否仍長中大？這是一個「謎」。

吳氏接長中大，已屆兩年，但自去年「一二五」學生運動後，先後表示辭職已不下二十餘次，每次均爲校內師生所挽留。分析渠之辭職，不外二因：（一）吳氏爲一物理學者，自稱「一介書生」，對於實際行政工作缺乏經驗，而中大爲全國最大之學府，地處首都，一舉一動，皆爲官方密切注視。且校內組織龐大，人事複雜，實非「一介書生」之吳氏所能應付裕如。（二）在國內戰亂之局勢下，教育面臨災厄，教育經費的短少，影響學校發展；現實政治的腐化，激起學生運動。凡此種種，均足增加長校者之困難與苦惱。觀吳氏每遇困難挫折時，渠卽表示辭職，不爲無因。

至于學生之擁護吳氏，並非表示熱烈愛戴而毫無不滿。吳氏平日對學生接觸甚少，亦不瞭解學生，故學生對他亦常有不滿之表示。如本年暑期中文系之解聘教授事，學生方面卽認吳氏難辭其咎。誠如校中一位老教授對吳氏的批評：「譽者不能居，惡者不能去」。不過，學生方面亦能諒解吳氏，因爲在目前這種局勢下，以一學者接長這個掛着中央牌子而一再在政治環境下拋來拋去的大學，實屬非易，所以學生是無條件的擁護他。卽使對校方有所不滿，亦決不放棄擁護吳氏的原則。吳氏對同學之直率誠懇的態度，亦屬令人珍貴。況在今日，教育雖不開政治，吳氏長校，外有當局之密切注視與指示，內有各種潛在派系之牽掣，吳氏又怎能自由施展其理想！

吳氏此次被派出國，實應追溯至「五月學[illegible]運動之先，中大教授會發表挽救教育危機宣言，對形成學生運動，不無影響。五月學生運動中，中大學生首倡於先，且支持達三星期之久，當時吳氏雖對學生不表同情，但亦無法阻止，且教授中對學生同情者極多。當局對渠之不滿與責難，已屬必然。

本年暑期，當局通令各校解聘同情學生運動的教授，與開除學生運動中的領導份子。但有少數愛護學生而有正義感的校長們，不願認眞執行，以致遭受上面的嚴責譴怒，上海交大校長吳保豐的被迫辭職離校便是一個例子。當時吳氏眼見到學生們熱烈擁護的吳保豐校長如此「身敗名裂」，也不得不爲自己警惕。況且吳氏是一個負有國際聲譽的物理學家，其學術地位與學術工作很足珍貴，如因負責行政工作而招致當局之嚴詞責難，自非彼在精神上所能承受。如若無條件隨着當局的意志唯唯是從，亦所不願。但吳氏畢竟沒有吳保豐先生那種毅力，敢與外來壓力作尖銳抵抗，在如此「進退維谷，左右爲難」的情勢下，吳氏惟有堅請辭[illegible]

八月六日，校中突聞吳氏辭職獲准，學生極感不安。當時有校中某新聞性報紙之記者，急趨校長寓所謁晤吳氏，吳氏一邊避走，一邊連說：「你們管這些事做什麼，你們安心讀書好了，這些事你們不必管」。又有記者晤劉慶雲訓導長，劉氏則謂：「校長辭職極可能，但還不會這末早。校長辭職已經二三十次了，每次到教育部均聲淚俱下。但辭職照准說，純係謠傳」。後卽以交大爲例云：『現在校長辭職正是時候，學生擁護他，教育部也挽留，如果萬一不幸像交大那樣，對兩方都不好』。學生方面因之極感惶恐不安，故在民主牆上有「願吳校長永長中大」之呼聲。

吳氏表示辭職，校內學生熱烈挽留。使教部不得不予愼重考慮，且教部如准予吳氏辭職，繼任人選之擇定與其能否得到學生之擁護，實屬難事，在此情形下，就是教部也不得不挽留吳氏。因之吳氏辭職並未獲准，而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的消息則隨之由官方發出。

，劉慶雲訓導長則已辭職，校方並於九月十一日正式公佈沙學浚教授繼任訓導長。劉氏任職半年，深得同學之熱烈愛戴。五月學生運動中，渠不接受某機關交下之「黑名單」，其後，中大同學得有安全保障，與未被開除，也不能不說是劉先生各方奔走折衝的結果。因之，當劉氏辭職之說傳出，民主牆上亦有學生紛紛呼籲挽留。學生方面認彼之辭職係受內外壓力所致，爲中大民主作風更替之象徵，但渠則表示『辭職純係爲便利私人敎書及家務累贅所致』。

十月廿二日，吳氏離校前夕，分別在四牌樓與丁家橋，召集學生訓話。吳氏稱：『此次出國，須五個月後始能返國同學須在進步中求安定，安定中求進步。中大同學四五千人，規模龐大，盼勿輕信謠言，將小事擴大。青年可以關心政治。研究政治，但決不能利用學校作爲政爭場所，中大應成爲學術的最高學府』。接着報告校政甚詳，全體學生並以簽名函吳氏致敬。

吳氏已出國了，返國後是否仍長中大，頗爲各方關心。據權威方面透露，甫告歸國之胡煥庸教授，極有繼吳氏接長中大之可能。

[illegible]物」的概念，則吳先生似乎還可把這另一個「物」之概念之所以不能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理由說明白，以求說理嚴密。再不然，吳先生也應將馬克斯主義必須只能用同一的基本觀念去解說社會並解說自然現象，而不能用「生產方法」及另一種「物」的概念去分別解說社會及自然現象的論據說明白，才可使自己理論周密。

其次，吳先生解釋馬克斯的階級劃分的標準爲「一個人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與其當時流行的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是極中肯的見解。不過當吳先生談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時，又說：「馬克斯認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三個階級，卽資本家或資產階級，工資勞動者或無產階級，及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第一一一頁）吳先生並接着去分析此三者間的實際關係，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的社會關係，並用以再去說明它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倫理學說的影響。在這方面，我覺得，地主階級原也是不宜於忽視的。就馬克斯的經濟學說看來，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地主階級值得注意；資本論中的若干篇幅，都與地主階級有關而與中產階級無關。再就歷史來說，地主階級與資本家間的從經濟利益到倫理學說的鬥爭更是人所週知的。而且此兩階級間對立的程度及實力的消長，又在在影響着某一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化的程度。因此，爲求理論的完備起見，地主階級與其他階級間關係之分析也是值得一談的。不知吳先生以爲然否？

總之，這本書是很有價值的著作，我服膺拉斯基對它的批評，現在把它引用來作爲本文的結束吧：「我相信它將是該類文獻中的一個有價值的貢獻」。

十月卅日夜

廣東的走私

陳微子

（觀察廣州通信）勝利復員後的廣東，走私情形，日見猖獗。港穗間巨額走私被查獲的，過去有好幾宗。其一是穗市沙面勝利大廈經理楊某的走私，全部走私物品為收音機及西藥。據六月中行轅公布偵查的結果，認為與海軍機關某要員極有關係；他們的走私工具是「砲艦」。其二是六月十七日，在由港穗開穗的廣九客車中，緝獲私貨計玻璃物品、鋼鐵條、香煙等一大批。其三便是七月十五日在由港到穗的佛山輪上，從機房右側煤炭庫中，緝獲私貨西藥、顏料、玻璃紙等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左側煤炭庫，搜出同等私貨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特製暗倉內，緝獲同樣私貨八十三大包，計時值二百億元。佛山輪特別製置了儲藏私貨的暗倉，倉門用鐵閘封閉，再加以螺絲，技術巧妙，要不是有人告密，是查緝不來的。

最近查獲的零星私貨時有所聞。同時，走私不祇限於進口，出口私貨也數不在少。數月前各地米糧偷運出口，轉港圖利，便曾猖獗一時。而且走私的方法形形色色，種類繁多。舉凡一切有利可圖的貨物，私梟們都不容放過。比如九月三日警探隊就曾在白鵝潭海面上的行總貨船中，搜出鎢鑛一千二百斤，這時貨船正將啓錠駛港。廣州當時時值每斤鎢鑛在百餘萬元左右，到香港便獲利一倍以上了。十月十四日海關又在穗市上九路第十號柏榮行內，會同員警搜出大批漏稅貨物。經過了七小時的搜查工作，計搜獲顏料、鋼機、玻璃紙、西藥、毛絨、毛冷、錫紙、等共一百八十五大包箱桶。據關員說，這項漏稅貨物，約值港幣三十萬元，經數次卡車運送，纔全部解回海關。

技巧與路線

每天廣九線上有幾千人在火車上來來往往。據一般的估計，其中最少有百分之五十靠走私為業者穿插其中。每天港穗來往一次，一百萬元的資本可拿二三十萬元的利潤。這些小規模的走私者，資本在五六千元港幣的不過少數，多數是千元港幣以下的。所以每天最低限度有十多萬元的港幣貨物在流轉。他們把小包的米、紗、綢，甚至三四十斤的鎢砂，當作行李帶了出去，又在香港帶些化裝品、絲襪、非林、洋參等物回來。這些物品輕便省事，不是運氣太壞，不會被檢出來。靠了這樣的來回奔走，便可以養活一家數口。

有些私梟具有極好的跳車技術，如果他們認為到達終站會逃不掉檢查人員的手腳時，便在將近終站的地方上跳了下來。在由港回穗時，普通的私梟是在石牌及東山附近跳下，再彎彎曲曲地回市的。私梟跳車斃命的事情斷斷續續地發生，往往路軌旁邊的斑斑血跡還沒有乾淨，新的血痕又印在這土地上了。

另一方面，在輪船上也是同樣的情形。曾經有過婦人偽裝受孕，企圖瞞過關員的耳目。入口的私貨是以呢絨、布疋、收音機、西藥、化裝品為多。但是零星的走私者，走私不過為了生活，和有力份子的走私是兩件事。有人說，想在廣九路局里面當一員雜役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薪水雖然不怎麼多，生活却夠豐裕的。在他們的收入部門中，大部分也與走私有關。

由於緝私工作的阻礙，私梟們不但在走私技術上講求改進，而且路線上已變更了不少。他們可以用膠袋裝住貨物，拋落河中，躲避關員的檢查，然後再慢慢用小艇偷運回來。他們可以由順德的容奇、番禺的市橋，輾轉偷渡港澳，和在樟木頭、深圳私運赴港。入口方面，可以經澳門至中山石岐，或從寶安至東莞轉運回來。有的是由香港乘火車抵石龍，轉搭電輪來穗。石龍河面的小艇，曾經盛極一時，爭先恐後地乘載私梟們附搭電輪。後來終於被憲警發覺，緝獲了不少私貨。但他們可以再變更方法，在抵石龍後，聯合了數十人集中一處，凌晨便由石龍沿河到博羅屬的石灣，曲折地到了增城，便搭公路車來穗。或者由澳門用電划經順德容奇，到了佛山的時候，便立刻可以到穗了。

沿海地帶

其次，在沿海地區，走私情形也不稍減。各地私梟聚為了將貨物運回內地圖利，多以澳門為集中點，將私貨轉運中山屬的灣仔、前山、橫琴一帶，以及台山屬的都斛、三埠和江門等處，然後再輾轉運回內地。澳門商人為了招徠顧客，紛紛在新馬路、酒盒街及草堆街擇地開辦洋什、洋烟、雜貨頭、呢絨、顏料等類商店。

還有的是鎢鑛走私，也可以和港穗間媲美。港穗間有一次在輪船上搜出了五十噸鎢鑛，可以稱為「鎢虎」；廣九軍上則備有十三敬斤的「鎢客」。但是陽江縣屬的南鵬島和寶安縣屬的大鵬灣，却是鎢鑛走私的大本營，是經常有電扒來往港澳的。南鵬島蘊藏的鎢鑛相當豐富，戰時敵人佔領期間曾經開採過。

在江門，這個漁鹽集散地，相當發達的商埠里，近來也鬧了私鹽充斥。累得海關派了二十艘砲艦去監視，可見私梟活躍的一斑，

特殊背景

港穗間的走私，從沒有精確的數目統計。但是廣州每一個人都明白，靠走私吃飯的人是相當龐大的。行經太平南路時，那些攤位上全掛滿了呢絨、西服、羊毛織品、大衣、玻璃襪……等等，價目總會比正式商店便宜些，那幾乎全部是沒有經過納稅手續的貨物。

粵海關今年六月份的稅收雖然沒有減少，可是增加甚微。據宣佈六月份的粵海關稅收約為一百億元，比五月份約增百分之十，但與五月份同時的物價和外匯比較，何已無形減少了。

年來的廣東走私機構，如所週知，是由官僚資本集團所領導，武裝護運，或者通過關卡人　的「熟性」，而鐵路、／路、水路並進的。實業公司前些時的「無稅糖」，是衆所週知的事實，而且從敵人手里接收過來的幾隻輪船，更是一種極大的方便。在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走私下，不但使全省生產事業崩潰，國家稅收喪失，而且正常的商人已無事可做了。因為私貨和正式進口商的貨物相較，價格相差達二分一以上，全部都遭受虧折之苦。

據一般的估計，去年海關緝獲的私貨當達一百億元以上。今年以來，每月自港運入的私貨也在九萬噸左右。由於走私數目字的龐大，根據統計處的公布，本年五月份廣東各海關出口淨值為七〇〇、三一八、三四六、〇〇〇元，進口淨值為六〇〇、六五一、五二二、〇〇〇元，比對之下，便「出超」一九、六六六、八二四、〇〇〇元了。

對大規模集團走私「老虎」沒有制止，却對零星的走私「蒼蠅」搜查沒收，問題始終解決不了的。零星走私者的冒險預示了一個生與死的博鬥，官僚集團的存在纔絞殺民生的路子；這不單是走私和緝私的問題，而是一個最現實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十月十九日。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余才友

簡歷：生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籍直隸天津。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畢業於南開中學。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考取遊美學務處公費留洋，入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習電機工程，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畢業返國。五年（一九一六）秋任清華學校物理教員。十四年（一九二五）秋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十五年（一九二六）任清華教務長。十七年（一九二八）赴美任留學生監督。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二月返國任清華校長迄今。現年五十九歲。

一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二日，全國各地清華校友會同時舉行紀念會，慶祝梅月涵先生服務母校二十五週年。美國吳士脫大學亦變更親領往例，授予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這，無疑地，是清華大學的一件大事，同時，還也是全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在這樣大規模的祝年會裏，各方面的教育當局，教育界名流和清華校友，或由書面，或由講演，發表了他們底頌詞和感想。他們說梅月涵先生有「民主的風度和涵養」。或者說他「教鍊三善，化洽四裔，惠澤滂流，高風遐被，朝野欽其文采，中外仰其聲施」。或者說他「以其畢生精力，悉瘁清華一校，數十年如一日；抗戰後，清華遷地聯合設校，丁茲環境困難經費不裕之際，其苦心孤詣，尤堪欽崇」。或者說他是「一位嚴肅而緊張的紳士，腳步迅速而有力，說話總是那麼誠懇，忠厚，他決不是煽動家，從不作聳動人的言詞，可是他卻也不是一味嚴肅，一味作其言也訒的仁者的，他有時卻也是一個富有風趣的智者，也很會開玩笑，那諧謔卻又多半機敏而高雅」。或者說他是「誠懇，公平，而具備中西美德的眞君子」。或者說他「和藹可親，遇事鎭定，遇危難更鎭定。國難中之清華，他能應付裕如，困難到來，他以身當之，決不閃避」……等等。當然，這些頌詞和感想，都是對他最公允而最恰當的評價。潘光旦先生說：「試問，清華所培植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鍥而不舍的，已有幾人？試問，目前從事於大學教育的人中，或負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從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試再問，一般從事於高等教育的人中間，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於大學環境之中，十年如一日的，中國之大，又有幾人？」所以周寄梅（詒春）先生說：「自我國舉辦新式教育以來，數十年間，教育界同仁中不乏堅苦卓絕終身從事教育之士，顧其間，亦有一部份同人，中道改途從政，無論其改途之原因是否由於不甘寂寞之一念，或迫於人事上之不得已，亦無論其改途後對於國家之貢獻是否較不改途爲大爲多，對於原來所服務之學校及其個人，總不免爲一種損失。余爲中途捨教從政之一員，但余反對近年來逐漸形成的教育家紛紛從政之趨向，余認爲今日教育界同人所負之使命，較任何人爲重爲大，余甚願梅校長之服務精神，足以感召學人急起糾正上述之趨向」。

本來清華校友通訊的祝年專號（二十九年九月）想請梅月涵先生寫點二十五年來的經過和感想。不過他十分謙虛地謝絕了。他說：「我覺得沒有甚麼可說。」再說：「我不用說甚麼。」但是，全國各方面的獎譽像雪片樣地飛來了。對於這，他只好假昆明校友在雲南大學集會之便，發表了一篇十分簡短的答詞：「無論那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祇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爲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爲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這個學校的校長作一種獎勵的表示。諸位覺得一人在一個學校服務廿五年，應予鼓勵，其實在清華服務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馬約翰先生且達二十六年之久，可見清華近些年之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個人的緣故。承諸位勉勵，再爲清華服務二十五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願做，但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歲，在這以後的二十餘年，未必還能大有用處，那麼愛清華的人，必不願以老朽累清華。不過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個船，飄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此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與清華的同人校友致告無罪」。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提前在清華園大禮堂隆重舉行三十六週年校慶（四月廿九日）紀念會。在梅月涵先生向四百八十餘校友和一千五百餘師生報告學校復員的經過，內心感覺到異常興奮和愉快。照他過去的說法，他已經把清華這隻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了。到現在，他可以向清華的同仁和校友「致告無罪」了。

二

還記得，明成祖定都北京，還移江南大族安定北方局勢的時候，梅月涵先生底一位數世前的曾曾祖，一位顯赫的皇家駙馬，從原籍江蘇武進落戶到了天津衛。那是五百多年前的事了。五百年來，梅家的子孫讀書從政，在天津衛梅官屯維持了一種富貴榮華的士大夫門第的局面。

不過庚子年（一九〇〇）的「拳變」給梅官屯，也像給其他許多大戶一樣，帶來了不幸的厄運。在庚子年前，雖然梅官屯也在漸漸地沒落了。但總還能說得上小康。在這之後，五百年的士大夫門第就整個兒地破產了。梅家的子孫不得不離開「學優則仕」的道路，有的去學生意，有的從事勞力工作，支撐着一種艱難困苦的生活。梅月涵先生出生在庚子前十年，從小飽經憂患，遭逢了家庭悲慘的變亂。十歲的年紀，學生意早就過了時候，從事勞力工作也正好開始了。但他還是沒有學生意，沒有從事勞力工作，還是在士大夫的道路上走下來了。

梅月涵先生底老太爺字臣，號伯忱，是一位個性極強，有膽量有魄力的人物。他中過秀才，但有新的思想。他覺得，那怕生活再苦，總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書。再，他覺得，他自己的那一套，如讀四書五經，寫公文程式之類的東西，再也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了，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洋書」。在那時候，他底族人們說：「孩子們大了，憑麼不叫他們去學生意呢。」或者說：「叫他們去賣力氣，也可以養家糊口呀。」或者說：「讀書最沒有出息。」但他堅決排除衆議，還是把他底子女送去讀書，送去讀洋書了。他有五個子女，梅月涵先生排行第三。他把梅月涵先生底兩位姐姐送去天津女子師範學堂讀書，在四五十年前的社會，眞可說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從梅月涵先生回國之後，他對另外兩個子女的教育就再不過問了。他那放心地說：「去找哥哥吧，他會照顧你們的，他不會錯。」所以，這樣一位忍辱負重，不避危難，而特力獨行的人、對梅月涵先生的影響多大，而留給的印象又多深刻！

還記得，嚴修先生是當時的學部侍郎，思想相當新。他覺得救國之道，就是在舉辦新式教育，所以在家裏而成立了家館。嚴家也是天津衛的大族。由於世交的關係，梅月涵先生被送進了他底家館讀書。當時教館的就是張伯苓先生。

之後，由嚴修先生集資，由張伯苓先生負責，南開學校於是開辦了。梅月涵先生也就是南開學校第一班的學生。在學校裏，他還是軍樂隊的隊員，吹小笛子。他那時候讀寄宿，每當他穿着制服，帶着小笛子回家給弟妹們吹一段的時候，他底弟妹們還十分羨慕呢。後來，他以第一名在南開學校畢業了。他們給母校打了一口井，留作紀念。

梅月涵先生在美國的時候，還從各方面節省，好剩下幾塊公費來，那麼按月寄回家，貼補家用。從這裏，可以知道他十分愛他底家。可以知道他願對家負責任。到回國之後，他底父親年事已長。整個兒家的重擔，於是就扛在他一個人底肩頭上了。

三

回國之後，梅月涵先生開首在天津青年會工作。他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秋進清華的。他服務清華可以分做兩大時期：一是校長以前；一是校長以後。

校長以前的時期，梅月涵先生最初當算學教員。後來教物理。他在教課之餘，還兼任童子軍的排長。和他一道兼任排長的還有林語堂先生等。童子軍都是中等科的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他以童子軍的三大美德——智，仁，勇，和那些天眞活潑的小孩生活在一起，享受了人生的樂趣。那時候，他除開讀書之外，還喜愛打籃球。他打中鋒，打得相當棒。

之後，梅月涵先生被教授會公推作教務長。那時候，教務長和教授的接觸比現在多得多。教授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外國人；一派是中國人。兩派之間不常來往，關係十分冷淡。他站在教務長的地位，對兩方面都保持了一個公正無私的關係。還對清華的教務，可以說起了一種示範作用。

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梅月涵先生還當過代理校長。不過時間十分短促。三個月後，他就到美國當留學生監督去了。

校長以後的時期，又可以分成好幾個段落：一是清華大學；一是長沙臨時大學；一是西南聯合大學；一是復員費的清華大學。

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一月，國府任命梅月涵先生爲校長。那是九一八之後，國家遭逢了空前的困難。北平各院校也遭逢了空前的困難。但他主持校務，反能有長足進步。他本來是學電機工程的。所以他特別注重理工教育的發展。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呈准添設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和原有的土木工程學系而成工學院。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呈准建築機械工程館和電機工程館，設立金工木工工場。暑假後，接受資委會津貼設立航空講座。並進行航空工程的試驗。增設農業研究所，添置發電機改建電廠。建造航空試驗館和飛機庫房。偏重理工教育，這功績的大小，雖然還不能有定評。但抗戰時期，理工學生對國家的貢獻，卻又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於是，清華的教職員和學生的人數是急遽地增加了。梅月涵先生對大學教育的目標，是認識得十分清楚的。他覺得要讓教授們有一個好的研究和傳授的環境，要讓學生們有一個理想的讀書的地方。所以開首就呈准添建女生宿舍，男生宿舍第五院，和西院教職員新住宅。二十三年又建築新齋男生宿舍和美如仙境的新南院教職員住宅。暑假後，又加建平齋男生宿舍和齋新後兩列。

清華的民主制度誕生於十八年（一九二九）。但這制度是異常脆弱的。梅月涵先生是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長。在教授會和評議會裏，也有「吾從衆」的風度和涵養。而學校的一些大事小事，又都要由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決定。他本人不願意變更多數的意見。但他不是沒有主見的。他是一位能幹的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集大成的賢才。

對於誠實而負責的人，梅月涵先生是要想設法地去幫助他的。比如馬約翰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馬先生說「我每次請教員，領經費的公事，梅先生都是照批的。我每次說謝謝他，他照例說，馬先生不要謝謝我，我們都是爲着學校，用不着客氣。」

梅月涵先生的酒量相當大。在公餘，他常願意和朋友坐乾杯。有時候，他也愛聽京戲。

抗戰後，清華遷地長沙，與北大南開合辦長沙臨時大學。他最早到長沙。當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九月十三日開籌備會的時候，他是主席。之後，一切臨時大學的校務都由他全權處理。後來因爲時局關係，臨時大學奉命結束。三校又遷地昆明合辦西南聯合大學。他單獨留下來辦結束，遲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底才離開長沙。

西南聯合大學在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學、梅月涵先生是聯大常務委員會的主席。我們知道，張伯苓先生是長期留在四川的。而蔣夢麟先生又常在外面走動。所以聯大的校務實際操在他一人手裏。因爲三校的傳統不同，學風不一樣，管理起來十分困難。不過他以誠懇待人，以公正處事，任勞任怨，茹苦含辛。幾年來的慘淡經營，使三校的精神合而爲一。李以昇先生有次到聯大講演，說「南清北合，聯大花開」，一時傳爲佳話。

至於清華單獨的事業，在抗戰開始後，農業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和無線電研究所跟着遷設到了昆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秋，因爲地方和時代的需要，在梅月涵先生主持之下，國情普查研究所和金屬學研究所也先後成立了。後來，清華又與資委會合辦雲南水力的探勘，與交通部合辦公路研究的試驗。另外，文理法三研究所在經費極度拮据下，仍舊繼續進行。而留美公費生考試，在戰前曾經舉行過四屆。戰後，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先後舉行兩屆，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到戰爭結束的年代，五研究所已併入有關的系院裏面了，她們都有了內容翔實的報告，水力探勘之結果已爲有關當局採用，而公路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效果，對國家都可以說有了貢獻。

最後要附帶介紹的，就是梅月涵先生的夫人韓詠華女士對他底事業很有幫助。他還有四位小姐和一位公子。公子祖彥排行第四，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從軍，參加美軍通譯工作，現在美國。大小姐祖彬已畢業於聯大外文系，現在清華助教，二小姐祖彤，已畢業於聯大生物系，曾任聯大助教。三小姐祖杉，已畢業於聯大社會系。五小姐祖芬現正準備投考大學。

本刊合訂本

第三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一卷下冊（有）
第二卷上冊（重印中，不日裝竣）
第二卷下冊（有）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可裝訂）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票：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掛每冊二萬三千元

書評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李理黃

吳恩裕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卅四年一月初版　一三四頁。

馬克斯的學說，介紹到中國來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它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刻。隨着它的輸入，反馬克斯主義的思潮也興起了。拋開它們相激相盪對社會實際的影響不說，單就思想看來，它們也顯然在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文化活動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不過，有很多信仰者特別是批判者，其贊同與反對，似乎往往帶幾分情感作用，這種態度是不會有助於學術的進步的。因此，用客觀而公正的態度，去研討馬克斯的學說，以說明它的眞實面目，還是很必要的。

這本書的基本態度，正是如此，著者在序中說：「本書的性質，猶如我十年前出版的那本『馬克斯的哲學』一樣：既不取感情上的贊成態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對態度。我只是對馬克斯的學說，做純粹學術的研究。」我們讀過這本書後，也感到著者對這一點確已做到了，他本着客觀的態度，用歷史的眼光及分析的方法，把馬克斯的學說中的一些基本要點，完滿地闡明了，並把若干重要的但却一直爲人忽視的理論關節解說明白。在這些方面，著者是成功的。

這本書的內容，實際上並不限於「政治思想」，著者自己說他在這本書中，「分析馬克斯所有關於方法，哲學，歷史，經濟，政治，倫理各方面的理論」。全書共六章：第一章是「方法與方法論」，目的在說明馬克斯自己方法的性質，以及他對於方法論的意見。第二章「反玄學的論證」，說明馬克斯學說之爲一種激烈的反形上學主義。他這個反形上學的學說系統，普通叫做「辯證唯物論」或「歷史唯物論」。這種學說，一方面是種歷史觀；另方面也是種革命論。於是第三章就是「唯物史觀考釋」；第四章則是「革命理論闡微」，分別解釋這兩方面。第五章是「評康德及邊沁」，除說明馬克斯批評此二人的倫理及政治學說外，並指出馬克斯所用以批評他們的方法，故而與第一章的理論互相印證，同時又算說明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具體應用。最後第六章是「論道德與人性」，目的在把馬克斯自己對倫理或道德以及人性問題的見解，考據出來，並加解釋。

這本書是吳先生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論文，曾得拉斯基教授的稱許。內容踏實而客觀。各章中多獨特的見解。現在隨便舉出幾個例子如下。

首先，當吳先生談到辯證法則的性質時，他闡明了一個常常爲人誤解且用以攻擊辯證法的問題。他說：「也許有人說，辯證法不過是個假定，你假定外界物事辯證地動，轉過來又去辯證地了解它們，這豈不是轉圈子嗎？這的確是個很大的理論問題。我們雖然不能解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却可以說，這個問題，並不能駁倒馬克斯的辯證法。何以呢？因爲其他科學方法，也發生同樣的問題。任何科學方法，祇要它企圖分析外界，必先假定外界確有某種『條理』(order)可供分析；而並非漆黑一團，無法捉清。（至於這個『假定的條理』，是完全屬於外界的呢，還只是我們人類悟解能力的產品呢，那是知識論上的問題。即使有法證明這種條理是屬於外界的，我們所『知道』的條理是否即是外界的『自然的條理』，都是問題。我們現在不討論這些問題。）既然如此，則馬克斯的方法，何嘗不可以拿辯證法爲一關於外界條理的假定呢？若果把辯證法視爲這樣一種東西，則它在馬克斯的系統中，確可產生某種關係。」（第十六頁）

其次，在談及爭論已久的辯證法與形式邏輯之關係一問題時，吳先生提出了一種看法。他先說明形上學思考方法與形式邏輯並非一個東西，再說明與辯證法相衝突的是形上學而非形式邏輯。他說：「形式上邏輯不研究實際物事的性質，它研究表現在命題中之物事的架構或關係。它又從這種關係中，推引出結論。」（第十八頁）「它是一種分析的手段，它既可把命題的意義弄明顯；又可當做一種證示或表述的方法。」（第十九頁）而「我們再看一看形上學思考方法，他可發現：在消極方面它缺乏形式邏輯的形式性質；在積極方面它又妄想『只由靜坐與思考，去發現宇宙，生命之將來，以及人類之命運的眞理』。可是形式邏輯則有意地避免這些問題。其實形上學家，緊抱一些範疇和抽象的公式，也沒有能力去解答那些問題。他們不過只是用形上學思考方法，自創『物』，『本體』一類名詞，要妄想由分析這些東西，便可以求得宇宙的眞理而已。他們並不眞的去研究外界的事實。」因此，「形式邏輯和形上學思考方法，是斷然不同的。前者只是一個形式的系統，由原始概念和命題 (primitive ideas and propositions) 出發；並不斷定經驗中的任何眞理。後者自以爲是一個宇宙的眞理，却又不是由分析物事得來的結果，不過止於分析抽象的觀念而已。因此，如果勉強把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當做一個斷定實際物事之行動的眞理，同一律當然沒有這種資格。實際上同一律並不是那種斷定事實眞理的東西。但是近來的馬克斯派學者，却把此二者混爲一談。」（第十九頁）所以，「若把辯證法視爲論事實法則的東西，則形式邏輯中的思想律和它並不衝突。」就同一律說，「物事本身運動的情形，即使可以受辯證法的支配，但其名稱的意義却要受同一律的支配。」（第二十一頁）就矛盾律說，「批評矛盾律的人，可以主張：一個物事能變成其他物事；但這與矛盾律無關。因爲矛盾律對於物事的行爲，並沒有表示意見。」（第二十一頁）這就是說，把辯證法看成論事實的法則，則與它相衝突的是形上學而非形式邏輯。相似的見解，在過去張申府先生也似曾提出過。按這種看法：則前數年所爭論的形式邏輯的揚棄問題，也許就無提出的必要了，或者，問題要換成另一種提出的方式了。

再者，在辨別「生產方法」與「生產能力」的分別時，吳先生的分析也很鞭劈入裏，他由馬克斯的著作中及「生產方法」一詞中「方法」一字本身，去證明「生產方法乃是一個集合名詞，聯合地指述在活動中的生產諸力。而生產諸力乃是分別地直接指述上述三種因素（按指勞動力，原料，和工具）。」因此，「可以斷定：馬克斯認爲生產諸力是死的，未實際參加生產工作的勞動力，工具，和原料；而生產方法是指參加生產過程的動的勞動力，工具，和原料所表現出來的樣子或形態。」（第四十九頁）把二者的分別說明後，吳先生更指出馬克斯認爲生產方法是決定人類歷史或社會發展的動因的理由，及死的靜止狀態中的生產諸力只能限制或影響生產方法的發展，却不能做決定生產方法發展的動因的理由；並駁斥了羅素反駁唯物史觀的意見。

峨嵋出版社發行新書

亡友魯迅印象記

許壽裳著•二萬二千元

我們崇敬魯迅先生，同他學習，除了要研究他的作品以外，還要認識他的生活。本書著者為魯迅先生三十五年的老友，所記為與魯迅先生生前交往的事實，其價值為研究魯迅先生的文獻中所僅見。且有珍貴文瑣掌故及重要史料，可供關心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參考。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王冶秋著•二萬六千元

魯迅先生一開始就與困頓苦難結不解緣。本書寫述魯迅先生由童年生活到求學，八年的海外生活，一直到歸國後的輝煌的文學活動，在本書中，都有最眞實的敘述，使我們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更加深刻。

羅斯福總統傳

張尙之譯•四萬元

羅斯福雖然死了，他的名字卻已成為和平、民主、自由與進步的象徵。這本傳記的特色是以他個人的事蹟為經，以世界局勢的發展為緯。原作寫在他生前，今請柏園先生加以補充，增訂羅斯福晚年生活和年譜，使成完璧。本書共十七萬言，譯筆流暢，為羅斯福傳記中材料最豐富者。

華萊士的呼聲

增訂本•三萬元

世界面臨著團結與分裂，和平與戰爭，華萊士的呼聲是全世界人民堅持和平，合作，民主的聲音。本書由梁純夫小魚編譯，初版出書僅二月，已銷售一空，茲特增訂再版出書。對華氏思想與立場作有系統之介紹，並將華氏參加羅斯福「新政」以來之重要言論搜集無遺，為瞭解華氏政治主張及當前國際形勢的重要參考書。

中國歷史簡編

吳澤著•四萬六千元

本書為國內唯一完整之歷史簡編本。自史前原始公會制以迄七七抗戰為止均有扼要簡明之論析。分章周密，條理井然，凡每一社會制度之經濟結構，政治構造，及由此反映之意識形態，無不予科學的處理與說明。作者為國內史學權威，本書為歷史教材之範本。

英語文法簡明教程

周光耀著•一萬八千元

本書取材專富，講解簡明，適用於中等學校之教學和自修。文法為寫作與會話的基本條件，本書對於英文文法規程，已編撰大綱，學者有能悉心研習，融會貫通，則對於英文學習，已覽定門徑，循序漸進，定獲造詣也。本書編列習題一百二十則均係英文文法上，必須具備之基本常識和最易錯誤的實習例子，俾使學者激發研究興趣。在研讀英文者，實應人手一冊。

歡迎批發　歡迎郵購

特約經售處：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電話：一三八二五號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圖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再如關於馬克斯的道德觀與人性論一問題（[illegible]很少；吳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重視的。他指出：馬克斯以為道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是階級偏見化了的，其涵義在於：第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社會關係的階級性實，對於道德的影響很大。在那種情形下，沒有施行一個普通應用的道德原則的可能性。第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道德學說，還有另外一種特徵，即它只能局部地估價人們的行為。第三，假如試再分析資本主義倫理學中之所謂「道德的命令」，我們也可發現它們與階級關係有密切的聯系。關於馬克斯的人性見解，吳先生指出：馬克斯「乃是主張：有求保持或改進個人之物質的生存形態，是一個關於人性的自然法則；它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是不變的。因為它若變了，人即不成其為人了。但是人的表現此種保持或改進物質的生存形態之趨向的『方式』，在各歷史時期，都不相同。所以馬克斯又認為：人性在每樣特殊的歷史期中，都有變化。這里所謂變化，即指表現『一般的人性』之方式的變化。」（第一二七頁）

此外，如解釋馬克斯說明自己所用的「抽象方法」與馬克斯批評形上學家時所說的「抽象方法」二者間的不同，如解說馬克斯的階級區分的標準等等，其都有很寶貴的見解。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感到有兩點疑問的地方，願商榷一下。

首先，吳先生在談及馬克斯哲學之可應用的適當範圍及其「唯物論」一詞的特殊意義時，他說：「馬克斯的哲學不是，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也不能是，一種無機及有機的自然界的哲學。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把馬克斯用以說明人類歷史的基本觀念（即生產方法）取消，則不能解釋到無機及有機的自然界的演化。目前有一趨勢，認為馬克斯的學說既為一解釋人類社會發展的學說，同時又是一種解釋無機的及有機的自然現象的學說。」吳先生的論據是：「我們所以認為馬克斯的唯物論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哲學者，係因它的『物』的概念(即生產方法一概念)，根本是社會的成分所組成的。……在自然界的演化過程中，並沒有生產方法的存在。……因此生產方法當然不是決定其內部發展的動因；而唯物史觀或辯證唯物論亦即不是解釋到無機或有機自然界的學說。」（第三十六——七頁）因此「假如我們勉強說馬克斯的學說是一種說明自然界現象的哲學，則必須放棄其生產方法一根本觀念；而另用一種既能解釋社會又可說明自然界現象的基本觀念代替之。可是，它假如放棄了生產方法一觀念，它就失去唯物史觀的核心了。」（第三十七頁）

據我們淺見，馬克斯主義中的「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並非兩個可以互相代替的概念。前者可包容後者，因此也較後者更抽象一些。前者確曾企圖將自然現象也加以解釋；但也更具體地用後者去解說社會現象。因此可以說，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論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應用。在這種具體應用中，「物」一詞的概念，誠如吳先生所指出，是指「生產方法」，但目前的趨勢却也並沒有嚴謹地竟企圖再倒轉來還用「生產方法」去解說自然現象。因為它解釋自然現象所用的「物」一概念，顯然並非「生產方法」，而是另一種「物」的概念。也許這另一種「物」的概念，在吳先生看來，是有形上學的傾向的，因此也與馬克斯學說的基本精神相衝突，從而不能引用。吳先生如提出這一點，加以檢討與批評，則在理論上或更周密些。因為邏輯地說來，馬克斯主義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物」，可能是「生產方法」或不是；如是，則吳先生的批評自（下接十五頁）